



一条老街，一段历史，光阴里写满了故事。得胜桥曾是武昌北城最为繁华热闹的一条老街。那里的一砖一瓦之间，都是老武昌城历史的缩影，沉淀岁月悠长。如今，武昌区加快建设得胜桥千年古轴，挖掘文化价值，修缮历史建筑，将呈现“一轴千年、昌盛市井”的老城活态文化街区。老旧的街道和巷子在静静等待着搬迁和拆除，拆迁意味着看一眼少一眼，半是留恋半是期待，半是烟火半是诗意。2021年以来，我利用周末休息的时间，常去那边，走走停停，瞧瞧拍拍，想留一点记忆给自己、给他人、给城市。

（供图 / 撰文 王大用）

编委会名誉主任：彭富春 周晓琦

顾问：（以姓氏笔画为序）

田子渝 刘玉堂 刘庆平 刘富道

严昌洪 何祚欢 张笃勤 陆永初

陈芳国 姚伟钧 涂文学 彭小华

编委会主任：张明权

副主任：朱向梅 董菲 杨华

熊少明 阮祥红

编委会成员：（以姓氏笔画为序）

万焕桥 王四清 朱永利 任丽英

刘海燕 李文洲 燕来宾 潘红莲

张智勇 陈胜利 林伟 陈红英

徐莉

主编：阮祥红

副主编：朱伟峰 丁星火

执行主编：丁星火

特约编审：简桦

本期责任编辑：许濛

编辑：刘玮 章旷怡

封面设计：王鹏

时代年轮

<<< <

4 追寻毛泽东视察的“武汉地理” / 简桦

风雨同舟

<<< <

14 一枝独秀景已然 满园春色更可待 / 张丽琴

九城同心

<<< <

17 矢志不渝守传承，阳新布贴吐芬芳 / 吕永超

委员天地

<<< <

22 仁和精诚护民安 双岗履职展风范 / 李智杰

商聚汉皋

<<< <

25 “用心做光”让城市生活更美好 / 杨冬梅

人物春秋

<<< <

28 杨叔子院士当参事 / 吴远舟

目 录

C O N T E N T S

史海钩沉

<<< <

33 武汉大学主校门 130 年的演变 / 徐应荣

39 汉水主泓历史上在哪里汇入长江(下) / 张笃勤

往事漫忆

<<< <

47 我的歌唱家老师段君亮 / 周希正

都市史话

<<< <

52 一块石碑再现百年消防往事 / 陆时正

三镇拾遗

<<< <

55 1938 年白求恩在汉阳天主堂的一周 / 高锐庆

目录索引

<<< <

59 本刊 2023 年总目录

63 征稿启事

<<< <

主 管：政协武汉市委员会

主 办：武汉市政协文化文史和
学习委员会

编辑出版：《武汉文史资料》编辑部

发行范围：国内外公开发行

发行单位：《武汉文史资料》发行部

国际标准刊号：ISSN1004-1737

国内统一刊号：CN42-1056/K

印 刷：武汉市仁大印务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每月 28 日

定 价：8 元

地 址：武汉市汉口沿江大道 246 号

邮 编：430010

电 话：(027) 82220669 (传真)

E-mail: whzxwszl@163.com

追寻毛泽东视察的“武汉地理”

◇ 简 桦

轮印：今年12月26日，是毛泽东同志诞辰130周年纪念日。大革命时期，毛泽东在武汉叱咤风云。共和国成立后，毛泽东关注经济建设与城市发展，从1953年开始亲临武汉40多次，足迹遍及三镇，巨手绘出蓝图。

1953年2月，当京城千家万户欢庆春节的时候，毛泽东的专列则向南方出发，第一站选定武汉。抵达大智门火车站，适逢一场瑞雪，迎接伟人重回故地。自从1927年赴湘发动秋收起义，弹指一挥26个春秋，他也进入花甲之年。

2月16日至19日，正值大年初三至初六，这是解放后毛泽东首次视察武汉，也是他平生首次走遍三镇。



1953年春节，毛泽东在雪中抵达武汉视察

那场瑞雪飘过去整整70年，毛泽东身披点点雪花的身影依然如昨。今年12月7日农历大雪，笔者专程来到武昌都府堤毛泽东旧居，一个个展板，一张张图片，记录了毛泽东视察武汉的足迹。



1956年4月，毛泽东在武汉国棉一厂纺纱车间视察生产工作。



1957年9月6日，毛泽东视察武昌纱厂。



1958年9月，毛泽东视察武昌第一纱厂。

19日，接见江岸区大智街街长陈光中，了解街道居民生活、组织建设和民主改革情况，要求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特别强调克服官僚主义、不要脱离群众。

此后到1974年的20年间，毛泽东不时来武汉视察，并在武汉主持召开中央会议。

16日，入住汉口惠济路16号招待所。深夜刚一安顿，立即了解情况，提出哪怕“坐划子也要到汉阳去看看”。大革命时期脚步匆匆，汉阳是他不曾去过的地方。

17日，乘船上汉水南岸，视察国棉一厂（汉阳铁厂、汉阳兵工厂旧址）。晚上，听取有关工业、手工业和公私合营情况的汇报。

18日，到湖北省委办公处武昌红楼听取全面工作汇报，登蛇山实地考察武汉长江大桥选址，下山在渡轮上与武昌县委书记赵学毅、乡干部王道华等基层干部座谈。晚上，约见武汉市分管工业的负责人和武昌区委书记，了解手工业和码头工人情况。



为真实体察民情，毛泽东戴上眼镜和口罩

1954年12月，听取武汉市委工作汇报；了解长江三峡工程建设情况。

1955年4月和12月，两次来武汉察看市容，听取农业合作化等工作汇报。

1956年5月31日，乘船视察长江大桥工地建设。6月1日，视察武汉国棉一厂、武汉重型机床厂，听取武汉钢铁公司建设汇报。

1957年9月5日，视察长江大桥。

1958年，更是毛泽东视察武汉的一个高峰年。4月6日，会见武汉地区科技界5000余名科技工作者。11日，参观武汉市地方工业品展览会。9月，视察武汉国棉一厂、国棉四厂、武昌第一纱厂、武汉重型机床厂、武汉钢铁公司、武昌造船厂、武汉大学等。13日，观看武钢第一炉出铁，会见苏联专家。11—12月，视察工业企业，对有关问题作出重要指示。12月28日，会见武汉市第三次党代会全体代表；接见湖北省、武汉市党政主要领导人，谈农业、工业调整等问题。

1959年4月，听取湖北省部分地委书记工作汇报，会见湖北省六级干部会议代表。

1960年5月，会见出席湖北省社会主义建设先进单位和先进工作者代表大会的全体文教工作者代表。

从工业到农业，从文教到科技，从市容到群众生活，从长江大桥到三峡工程，毛泽东视察的“武汉地理”，饱含对建设社会主义强国的思考与期待，正如他1953年首次来武汉视察时所说：“我爱进步的中国，不爱落后的中国。”

武汉长江大桥：挥毫“天堑变通途”

1953年2月18日下午，雪后初晴，红妆素裹。

这天，毛泽东在武昌阅马场红楼听取湖北省委工作全面汇报后，提出要上蛇山看一看。《菩萨蛮·黄鹤楼》曾经描写的“茫茫九派流中国”气势雄浑，但“沉沉一线穿南北”隔岸相望，京汉、粤汉铁路分成两段，火车过江得坐轮渡，修建“万里长江第一桥”迫在眉睫。志愿军铁道兵团前方抢修指挥所司令员彭敏，从朝鲜战场归来养伤，奉命上任铁道部大桥局代理局长，赶到蛇山汇报长江大桥选址方案和筹建进度。毛泽东举起望

远镜眺望江天，沿着逶迤山梁实地踏勘，欣然同意大桥桥址跨越龟蛇的方案。

早年在武汉，毛泽东奔走武昌、汉口两地，深深体会过“龟蛇锁大江”惊涛骇浪的凶险，笃定新中国要改变“万里长江无桥”的历史，先后四次提出建造武汉长江大桥的设想。1949年9月，新中国尚未宣告成立，毛泽东主持全国政治协商会议，通过了桥梁专家茅以升等人提交的修建长江大桥的议案。

这一史实，在中国桥梁博物馆历历在目。2019年9月23日，坐落于汉阳四新大道的博物馆尚未对外开放，笔者前往一睹为快，作为“老武汉”，竟然第一次见到毛泽东手迹“江汉桥”。《桥梁建设报》老总编余启新乃资深桥史专家，著有《毛泽东与大桥局》一书，指点展板如数家珍。

1955年9月1日，武汉长江大桥动工兴建。当年12月31日，长江大桥最重要的配套工程——跨越汉水的江汉桥建成通车。群情振奋之际，迫切希望主席能亲笔题写桥名。不到一个月，毛泽东在1956年1月22日为之题写“江汉桥”，其中“江”字写了两个，对其中满意的一个划了小圈。国家领袖为一座城市桥梁题名实属罕见，大桥人骄傲的将它制成匾额，悬挂在江汉桥两头。

1956年5月31日，毛泽东乘船视察长江大桥工地，详细听取建设进度汇报。大桥局局长彭敏回忆，毛泽东穿了件宽松的旧衬衣，来到船舱随意坐到他对面，首先询问工作经历，听说他只是在战争中抢修过几座桥，鼓励他说：“建设和打仗不一样，要从头学起；也和打仗一样，在战争中才能学会打仗。”



毛泽东在蛇山实地踏勘长江大桥选址



轮船从大桥2、3号桥墩之间驶向上游，再从3、4号桥墩之间返回下游，转一圈用了近一个小时。毛泽东看得很仔细，多次回头询问，包括机械名称、施工顺序、混凝土凝固需要多长时间等等。然后，回到船舱继续交谈，对工程的进展、遇到的困难、人才的培养、施工的管理逐一了解；同时，对桥梁科技知识也不放过，如什么叫压气沉箱法、什么叫“沉箱病”、什么是拆装式结构、如何进行流水作业、潜水工怎样才能沉下去等等。

毛泽东看汇报材料格外认真，连材料上多印了一个“4”字也指了出来。他对苏联专家用世界一流技术帮助建桥表示满意，当即明确提出任务：“要建成学会”“要在建设中培养出上百个建桥工程师”。他豪情满怀地对彭敏说：“将来长江上修上二十个、三十个桥，黄河上修上几十个，到处能走。”

毛泽东兴奋之余，首次在武汉下水畅游长江。此后四天，

一连三次。第二次游到大桥水域，从桥墩施工的吊船、驳船之间穿过，一边踩水，一边观察。6月2日第三次畅游后，气势磅礴的《水调歌头·游泳》在东湖客舍一挥而就，“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成为对武汉长江大桥最经典的赞颂。12月初，他在给著名民主人士黄炎培、周世钊复信时，将《水调歌头·游泳》录赠于其中。此后的1961年9月24日，毛泽东在已经建成使用的长江大桥旁再度畅游长江，邀请来访的英国蒙哥马利元帅上船观看，将一幅凌晨书写的《水调歌头·游泳》赠给这位二战名将。

1957年9月5日傍晚，长江大桥通车在即，毛泽东再次前来视察，他不顾柏油路面尚在铺设之中，全程从汉阳桥头漫步到武昌桥头，边走边问，兴致盎然。他向大桥局副局长杨在田一连发问，具体到“总共用了多少钢、多少混凝土、多少钱？”得到回答“2万多吨钢、9万多方混凝土、约7千万元钱”，他思忖片刻说“不算多。”他更认真地问杨在田：“有苏联专家在这里可以修这样的桥，如果没有可以修吗？”“可以。”他紧盯着



毛泽东翻阅《武汉长江大桥工程》画册

又问“可以修了吗？”“能修！我们有了很大的提高。”听到杨在田的自信回答，他满意地笑了。

来到桥中间，毛泽东见一处栏杆上漆着黑、蓝、灰三种颜色，问：“怎么漆成三种不同颜色呀？”大桥局政治部主任杜景云回答：“我们想征求群众意见，看栏杆漆哪种颜色好。”他称赞说：“好啊，搞建设也走群众路线。”

此时，夜幕降临，华灯初上，毛泽东凭栏远眺两岸，连声叹道：“万家灯火，万家灯火啊！”杨在田将《武汉长江大桥工程》画册送给他并请题词。他说“这可要好好想一想”，几天后派人送来题词，正是《水调歌头·游泳》中的名句——“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

时隔一年，1958年9月，毛泽东视察武汉钢铁公司、武汉大学等企业、学校后，又一次踏上长江大桥桥面，不时停下脚步，同大桥局职工及桥上群众交谈。



毛泽东同大桥局职工交谈

毛泽东对彭敏说：“我们还要在长江上建设南京大桥、宜都大桥、芜湖大桥。”

今天，领袖的愿望业已一一实现，仅仅是我们武汉，就有12座长江大桥凌空飞虹。

海军“长江”舰：构想“高峡出平湖”

1970年12月26日，毛泽东在关于“修建葛洲坝工程的建议”上批示：“赞成兴建此坝。现在文件设想是一回事，兴建过程中将要遇到一些现在想不到的困难问题，那又是一回事。那时，要准备修改设计。”

这天，毛泽东度过77岁生日，而构想三峡工程建设的战略，则在17年前。

1953年2月19日，毛泽东视察武汉结束，登上“长江”舰向南京进发，“点将”林一山随行。

林一山，从北平师范大学地理系投笔从戎，参加革命身经百战，转行就任长江水利委员会主任，毛泽东称他为“长江王”。1950年10月，林一山提出荆江分洪工程计划，毛泽东亲自审查设计书，批准立即兴建。1952年4月5日，荆江分洪工程全面开工，毛泽东题词：“为中国人民的利益，争取荆江分洪工程的胜利！”

今年夏天，笔者参加武汉市作协第八届代表大会，与《人民长江报》副社长陈松平结识，获赠其长篇纪实《不废江河万古流》。随后，武钢老友董宏量又相赠其新出专著《画梦长江》。两部作品来得好及时，内中都引述了林一山的回忆：上舰就谈，晚上留饭继续谈，不顾春寒料峭在甲板上谈。航行三天途中，除了上岸到黄石、九江视察，一连谈了三次，集中在长江流域规划和南水北调设想。持续时间之长、垂询问题之细，超出他和陪同人员的意料。



毛泽东在“长江”舰与林一山交谈

好在林一山作了充分准备，带来一册上海《申报》馆的老版《中国地图》。一生喜爱地图的毛泽东，拿过地图在桌子上铺开，开门见山切入正题，从全流域宏观入手，逐一了解山川形制、雨量分布、洪峰形成、灾害规律等方方面面的情况。

第二天，当林一山展开《长江流域水利资源综合利用规划草图》，汇报兴建一系列梯级水库拦蓄洪水的计划，毛泽东仔细端详后，用红铅笔点着三峡出口处问：“你在上游修这么多水库，能不能抵上三峡这一个？”

林一山回答：“都加起来也抵不上三峡一个水库的作用。”

毛泽东又问：“那为什么不在这个总口子上卡起来，毕其功于一役？先修这个三峡水库怎么样？”

毛泽东深谋远虑又细致入微，请林一山进餐时，一边吃一边对技术力量摸底：“你有多少工程师啊？”“有270位工程师。”他惊讶地说：“你的工程师讲百啊！”又问：“那么你有多少技术员？”“有一千多。”这回他更加惊讶：“哦，技术员都讲千啊！”

回北京后，毛泽东请来水利部长傅作义，转告林一山的重视人才之举，要求加强水利建设的工程技术力量。从此，在长江委和全国水利系统，“讲百讲千”的佳话传为经典。

毛泽东对林一山寄予厚望：中国是农业大国，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水利是农业的命脉，只有水利搞好了，农业才能长期发展。农

业发展了才能更好地支援工业。你们肩上的担子不轻啊！

果然，第二年1954年，长江暴发百年一遇的大洪水，中下游五个省123个县受灾，农田淹没4800万亩，群众受灾1800多万人，南北铁路大动脉中断整整100天。

毛泽东坚定了修建三峡水库、根治长江水患的决心，将之提到中央政治局议事日程上。1954年11月中旬，中央在广州召开工作会议，讨论国家第一个五年计划草案。毛泽东提议把三峡工程列入长期计划，在条件成熟的情况下修建大坝。对此“百年大计”，他一腔殷切期待，对年轻一辈说：将来我死了，三峡大坝修成后，写一篇祭文告诉我。

会后，毛泽东返回北京途经武汉，特意在专列接见林一山，再次询问包括地质条件在内的大坝建设问题，并就我国能否单独建设三峡工程深入探讨。

为了加快进程，毛泽东与赫鲁晓夫商谈，请苏联专家援助。1955年6月，第一批苏联专家到达武汉，在长江流域规划编



毛泽东视察三峡

制、三峡工程设计、专业队伍建设等方面，起到了很大作用。

1956年6月，毛泽东在武汉赋《水调歌头·游泳》，不仅讴歌“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的壮举，同时寄望“更立西江石壁，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的远景。不久，他在武昌再次接见林一山，幽默地说：“你看能不能找个人帮我当主席，我给你当助手，帮你修三峡大坝好不好？”反映出一种急迫心情。

但毛泽东秉持科学求实的精神，急迫之中有慎重。1958年1月，在中央南宁会议期间，他专门安排时间研究三峡工程问题，提议把林一山接来与持不同意见的电力部水电总局局长李锐“当庭论辩”。两人各抒己见之后，又请各写一篇文章三天交卷，第三天晚上开会接着讨论。

毛泽东在广泛听取意见后，提出三峡工程建设“积极准备，充分可靠”的八字方针，主张“少装机，少投资，先修大坝防洪”，委托周恩来总理主管，伸出四个指头说“一年抓四次”。

会后不久，2月26日至3月5日，周恩来和李富春、李先念两位副总理，率有关部门负责人和专家100余人，花10天时间全面勘察三峡。在三斗坪坝址中堡岛，周恩来拿起一截地质钻探岩芯反复观看：“带一截岩芯给毛主席看看。”

1958年3月8日，在中央成都会议上，毛泽东提议“三峡问题，就在这里解决”。毛泽东在审阅周恩来的报告时，在第一项中加了一句“从国家长远的经济发展和技术条件两个方面考虑，三峡水利枢纽是需要修建而且可能修建的”，在第五项正确处理六种关系中加了一种“发电与用电”的关系。4月5日，成都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三峡水利枢纽和长江流域规划的意见》，正式发出了总号令。



成都会议结束，毛泽东提出“我要坐船走长江看看三峡”。3月29日清晨，乘“江峡”轮从重庆东下。3月30日途经中堡岛，他走到船舷旁，举起望远镜从不同角度久久观察，认真倾听周围专家的详细介绍——这一天日期，便成为“330工程”代号的来历。

毛泽东对三峡工程建设的考虑仍在深化，他在“积极准备，充分可靠”的方针后，又加上“有利无弊”四个字。为此，他亲自安排有关三峡大坝的重大问题研究，批准在湖北蒲圻陆水兴建三峡工程试验坝、在北京官厅水库进行化学爆炸模拟试验、在新疆核实验基地进行核爆模拟试验，为三峡大坝建设及长期产生效益提供了理论和技术支撑，同时也避免三峡大坝成为国防安全的软肋。

1958年4月，毛泽东在武汉接见罗马尼亚代表团时，无不高兴地透露：“我们准备在三峡筑一个水库。准备工作需要5—7年，连筑成就要15—20年。这是我们的第一个大坝。”

1970年，“330工程”开工，几经曲折，积累了宝贵经验。1992年4月3日，经全国人大七届五次会议投票表决，通过了《关于兴建长江三峡工程的决议》，毛泽东为之魂牵梦绕的三峡工程，终于在他百岁诞辰之前，全面付诸实施。

1997年11月8日，三峡截流，举世瞩目。笔者想方设法约稿，在头一天《长江日报》周末一版刊出《三峡不会忘记》。电话打到北京采访，林一山已是86岁老者，双眼失明，只能听老伴“读新闻”分享喜讯。他深情回忆说：建国之初，毛泽东与周恩来商讨国家建设大计时说，我们国家大，要考虑搞一些大型建设项目，像三峡、南水北调、铁路通拉萨等。其中两大工程，在“长江”舰上交给了我，怎不感到责任之重大？

从1953年到1958年，毛泽东与林一山5年谈了6次。身在外地的部门负责人，鲜有如此“殊荣”。

“在总口子上卡起来”“向南方借一点水”——毛泽东高屋建瓴的战略考量，演变为“三峡工程”和“南水北调”两大丰碑，足以“当惊世界殊”！

2011年，国际河流组织权威人物在美国媒体发文：“都江堰体现出中国顺应自然的道家哲学，长江上的大坝则是毛主义征服大自然的象征，三峡大坝被视为全球大坝的建设范本。”

武钢一号高炉：亲见“钢铁要过江”

今年10月28日，“以文学名义致敬钢城”活动，选在武钢一号高炉遗址公园举行，这正是笔者想要追寻的第三个地方。

1958年9月13日，毛泽东视察武钢，准确具体地说，应当是他亲临高炉炉台，亲



眼注视武钢第一炉铁水出炉，由此揭开新中国第一家大型钢铁联合企业投产的序幕。

参观一号高炉的小小陈列室，惊奇地发现，毛泽东上下高炉铁梯的照片，有好几幅从未见过，如致谢苏联专家、接见先进生产者、观看机械操作，很有现场感和年代感。从高炉走出的湖北省作协原常务副主席李建纲年逾九十，他仍记得打开第一炉铁水的炉前工名叫包秀良。

陈列室的墙面，镶嵌着一行九个毛体大字——“吃了芒果，要吐出钢铁”，更是前所未闻。追溯源流，还有“我要游到武钢去”“今天出不来，明天再来”“不要紧，会多的会多的，下次我再来看”“钢铁要过关，钢铁要过江”“骑毛驴也要去看看”，都是毛泽东独特风趣的话语，每一句都蕴含有人动人的历史场景。

——“吃了芒果，要吐出钢铁”。1956年一个夏夜，毛泽东在东湖约见武钢



毛泽东在一号高炉铁梯上下

经理李一清、副经理韩宁夫，桌上摆出芒果、西瓜招待。他指着芒果幽默地说：“我吃西瓜，吐出瓜子，芒果归你们，吃了芒果，要吐出钢铁！”

——“我要游到武钢去”。1958年9月10日，毛泽东一到武汉，就询问武钢哪天能出铁。约见武钢经理李一清，得知国庆节前可望出铁，高兴地说：“到出铁的那一天，我一定要去看看。”湖北省委根据专家周密计算，决定将出铁日期提前到9月13日。当天，毛泽东从武昌汉阳门上船。船到中流，他兴致勃勃地说“我要游到武钢去”，下水游了20多公里。

——“今天出不来，明天再来”。下午3点，毛泽东来到一号高炉。一间炉前工休息室的平屋屋顶，临时用竹子交叉扎成护栏，就成了看出铁的地点。他问副经理韩宁夫：“今天什么时候出铁？”“下午三点半左右。”“有没有把握？”“有百分之九十九的把握，可能也有三分之一的例外。”“好呀，今天看不到，我明天再来，明天看不到，我以后还来。总之，三顾茅庐也要看到你们出铁。”

——“不要紧，会多的会多的，下次我再来看”。3点25分，炉前工包秀良和苏恒秀打开出铁口，炉长李凤恩站在二道出铁弯沟边，兴奋地欢呼：“毛主席，铁水流出来了！”顿时，炉台上下3000多人发出响彻天际的欢呼。毛泽东向炉前工鼓掌致意，同苏联专家握手致谢，贴近护栏向高炉下的人群挥手共庆。他全程观看第一炉铁水的诞生，热浪扑来全然不顾，衬衣都被汗水浸湿。时任现场技术主管、后任武钢总工程师的张寿荣院士，2021年在自传《钢铁人生》中回忆说：毛主席缓步走下平台，站在出铁场上，回首看还有无铁水出来，说“再多一



毛泽东用探火镜在炉前观看

点就好了”。炼铁厂厂长谢健有些自责忙上前解释，毛主席反而安慰说“不要紧，会多的会多的，下次我再来看。”

毛泽东见证的第一炉铁水，铸成第一批铁锭，每块重约40公斤，以待炼钢厂建成后熔炼成钢。2008年，中国首家钢铁博物馆——武钢博物馆开馆，当年的一块铁锭作为“镇馆之宝”亮相，引来无数钢铁人抚今思昔。

因为，第一炉铁水，不仅标志着武钢的顺利投产，也标志着新中国钢铁工业的庄严起步，武钢由此誉为“共和国钢铁长子”或“新中国钢都”。

武钢出现在华中大地，源于毛泽东布局“钢铁元帅升帐”的一盘大棋。早在1950年，就召开了全国第一次钢铁会议，新中国急需兴建一座大型钢铁基地，放在哪里呢？

当时，钢铁企业寥寥无几，大多又集中在北方，最大的鞍钢还在山海关之外。为扭转“北重南轻”的局面，毛泽东明确指出，新的钢铁基地要建在南方，最后决定落户武汉。

“钢铁要过关，钢铁要过江”。从1958年3月到9月，短短半年时间，毛泽东接连视察重钢、武钢、马钢、包钢、大冶钢厂和上钢一厂。9月15日，武钢第一炉铁水出炉后的第三天，毛泽东原本前往安徽视察，但临时又提出“再到黄石去看一看”。由此，大冶铁矿成为他唯一到过的铁矿。而且，5年间两次到同一地方视察，在他一生中也不多见。

为何毛泽东要说“再到”黄石呢？原是1953年首次视察武汉后，2月19日乘“长江”舰去南京途中，天黑时分见岸上灯光闪烁，他打听说是黄石，立刻要求上岸。安保负责人劝阻“黄石连马路都没有”，毛泽东回答“路不好，我就是骑毛驴也要去看看。”上岸后，他直奔大冶钢厂，从炼钢、铸钢到锻钢、轧钢，生产全程从头看到尾，可见其浓郁的“钢铁情结”。

如今，在一号高炉陈列室的展板上，有一枚硕大的奖章标示它的不灭功勋：一号高炉从1958年9月13日到2018年10月14日，60年累计产铁5426.18万吨。

这是新中国钢铁工业发展的一个缩影，足以告慰当年毛泽东用蓝色探火镜的深情顾盼。

毛泽东诞辰130周年来临之际，仰望武钢一号高炉，伫立长江大桥桥头，远眺三峡工程大坝，江城会永远铭记一份特别的“武汉地理”。

简桦，本刊编辑

一枝独秀景已然 满园春色更可待

◇ 张丽琴

人物名片：张丽琴，市政协委员，农工党江汉区工委主委，武汉长江蔬菜传媒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副总编辑。

1996年，我有幸成为在全国蔬菜产业享有盛誉的《长江蔬菜》一员。创刊于1984年的《长江蔬菜》，以“传播科技、服务三农”为己任，致力于报道全国蔬菜产销新技术、新品种、新模式、新经验。当时恰逢《长江蔬菜》创刊10周年，由刚刚离任市人大农村委主任的程耀明执掌社长大印，踏着改革的巨浪，带领我们一众热血青年，将《长江蔬菜》由一本籍籍无名的小刊打造成全国优秀期刊，发行量、广告额创下新高。

如今，长江蔬菜通过实施数字化深度融合发展和转型升级，已成功打造“期刊、

网站、微信、影视、APP”五位一体传播矩阵。在这个敢于有梦、勇于追梦、勤于圆梦的大家庭，我也经过多个岗位历练，经营、广告、编辑、管理，由一名业务主办成长为《长江蔬菜》编辑策划部主任、副社长，再到武汉长江蔬菜传媒有限公司的副总经理、副总编辑。

2016年、2017年，我相继被推选为区、市两级政协委员，2018年被组织任命为农工党江汉区工委主委。我深感责任重大，不忘服务三农初心，立足行业岗位，发挥党派优势，实现双岗建功。

春已到，何以缀河山

今年2月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做好2023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

作的意见》发布，这是 21 世纪以来中央连续出台的第 20 个指导“三农”工作的一号文件。文件充分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加强新时代新征程“三农”工作的鲜明态度，再次向全社会发出了重农强农的强烈信号。

作为服务“三农”的《长江蔬菜》，为适应时代发展，在调整自身服务方式的同时，也将触角深入到蔬菜一线，为解决蔬菜产业“最后一公里”问题释放媒体能量。2015—2023 年，顺应互联网发展和用户需求，强品牌、固根基，倾力打造“期刊、网站、微信、影视、APP”五位一体传播矩阵。2023 年 9 月，长江蔬菜优品荟商城全新上线，以提升深度传播和综合服务能力，帮助农民增收致富，助推我国蔬菜产业发展，助力乡村振兴。

农业科技期刊融媒体发展的春天已经来临，我们拿什么点缀中国这片沃土？新的形势对编辑的综合素质提出新的要求，能编辑会写作、能统筹会协调、能吃苦可成事成了必备素养。研读《学习习近平关于新闻舆论的重要论述》，我作为媒体工作者深受启发。我在取得注册责任编辑、记者、高级农艺师职称后，带领编辑及实习记者走遍蔬菜产业大县的田间地头，了解蔬菜产业中存在的问题，提出务实建言，助推乡村振兴。

我们激情满怀，辗转于田间地头，以文字、图片、视频多角度、全视野报道全国蔬菜产业大县蔬菜新型经营主体的典型，记录他们的酸甜苦辣，推广他们的致富经验，让更多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少走弯路、规避风险，让产业振兴真正落到实处，让更多的



2019 年在长沙市春润种业有限公司采访

农业人富起来，强起来。我们采写了《从门外汉到菜专家——郑从美的创业之路》《突破蔬菜产业瓶颈，扛起乡村振兴大旗》《从国家公职人员到莲藕经纪人，“莲藕大王”周志诚带领村民齐致富》《七大院士点评全球首个硒高效油菜薹硒滋圆 1 号》等报道。

2015 年，我被评为湖北省科协“科技创新源泉工程”科技期刊优秀编辑工作者；2018—2022 年，被评为湖北省科技期刊编辑学会先进工作者；2020 年，被评为“湖北省优秀期刊工作者”。

一子落，履职全盘活

在新时代坐标上，具大局意识、有担当精神，会谋事、能干事、善共事是政协委员和党派成员的履职根基。感谢组织信任，我被推选为区、市两级政协委员、农工党江汉区工委主委，这不单单是一份荣誉，更是一份责任。

毛泽东同志在建国初期时，曾用一根头发和一把头发的比喻，形象而又深刻地讲述了统一战线代表性的道理。用“一根头发”带动“一把头发”，这就是中国共产党百年



2020年3月向江汉区万松街电业社区捐赠蔬菜

聚细流，爱心助江城

作为一名政协委员和党外干部，更应具备家国情怀。回想起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为打赢那场攻坚克难战，我组织江汉区工委党员向防疫指挥部提交的有关抗疫情、保春耕等方面信息14篇，被防疫指挥部采用。

在当时医用战略物资紧缺的情况下，我们发挥农工党医卫特色和党派优势，调动党员资源，

多方筹措防护物资和捐款。因为与各区县蔬菜企业联系较多，我们向以前采访过的湖北省嘉鱼蔬菜专业合作社求援，给江汉区万松街电业社区捐赠蔬菜5吨1000袋。

涓涓细流汇聚成河，浓浓爱心助力江城。通过农工党武汉市委《关注》上报社情民意信息，传达民意，为民解忧。农工党市委网站发表《农工党员的担当——市商职医院支部党员在一线》《江汉区工委党员陈建刚捐赠10万元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不辱历史使命，做有作为有担当政协人》等17篇信息，为抗疫摇旗呐喊。

“一枝独秀景已然，满园春色更可待”。期待自己在岗位上的努力和付出，能换得未来的山花烂漫。

统战史上著名的“头发论”。作为政协委员和党外干部应发挥带动作用，一子落，履职“全盘活”，把更多的人团结在中国共产党周围，汇聚成实现伟大梦想的磅礴伟力。

作为农工党区工委负责人，我注重充分调动党员参政议政、建言献策，多篇建议被市政协对口协商会、农工党中央信息专报、湖北省政协《社情民意》、全国政协《每日社情》采用。

2021年，《科学辩证执行禁渔令，适时适度开展湖库生态调控》被省政协《社情民意专报》采用并转报省委省政府，推动湖北成为全国唯一获批启动五大湖泊生态捕捞试点的省份。

2022年，《豇豆、芹菜、韭菜农药残留超标问题亟待重视》《提升农产品流通效率亟待全国统一绿通标准》《推进茶产业支持政策精准滴灌、落地见效》《关于适当提高收买被拐卖儿童犯罪量刑标准的建议》被农工党中央《信息专报》采用，并上报全国政协；《关于适当提高收买被拐卖儿童犯罪量刑标准的建议》被全国政协采用，转送到有关部门。

矢志不渝守传承，阳新布贴吐芬芳

◇ 吕永超

2023年5月19日，第13个中国旅游日主会场活动在云南腾冲举行。在“中国礼物”旅游商品展示现场，阳新布贴“香佩系列”被国家文旅部选入其中。专家评介：“香佩系列”设计取材于传统阳新布贴纹样，自然淳朴地与现代元素相结合，体现了实用性、时尚性，是“非遗般的‘中国礼物’”。

远在千里之外，71岁的湖北阳新老人尹关山先生，得知这个消息后欣慰地笑了。



尹关山指导弟子制作阳新布贴



阳新布贴“香佩系列”

尹关山与国家级非遗阳新布贴血脉相连。他既是阳新布贴的发现者，史料收集整理和研究的拓荒者，也是在创新设计与制作上将这一传统工艺推到一个新高度的践行者。

慧眼初识阳新粘花

长期以来，一种传统的地方民间实用“粘花”工艺深藏于阳新乡村，不被外界所知。

1985年，湖北省文化厅为保护和挖掘省内民间文化遗产，动员全省文化系统的干部职工搜集“民间美术品”。在动员会后的两个多月，阳新县的美术品收集工作杳无动静，身为县文化馆美术干部的尹关山有点着急。他最朴素的想法是，阳新虽说是国家级的贫困县，但精神不能缺钙，工作不能被人瞧不起。33岁的他随即决定告别妻儿，打起背包，走村串户，去寻找遗落在阳新民间的文化遗产。

阳新地处鄂湘赣三省交界，大多数村湾依山而建，山高路远，交通不便，与外界联系很少，自然环境相对封闭。尹关山从当年的5月至7月一直奔波在山野间，解放鞋跑破了好几双，脚板上不知磨出了多少血泡，足迹遍布5个乡镇的18个自然湾，但收集上来的所谓工艺品绝大多数都毫无特色。倒是有两件用粘花工艺做成的小孩涎兜，如同乡间山花一般质朴、美丽。他隐约感知，这东西一定是“宝贝”。

有了目标就有了道路。尹关山在大德乡杨柳村欧湾有了突破性发现：这里的粘花涉及儿童服饰、童用童玩、婚嫁实用、生活家用和宗庙饰用等五种类型，同一类型没有两件是雷同的，上至七八十岁的老妪，下到十二三岁的女童，无人不会制做。尹关山背着第一批搜集到的多品种粘花实物，兴奋不已，一个劲地对随行的大德文化站小柯说：“谁说阳新没有民间艺术，关键是缺少美的发现啊！”



《童枕·狗》，尹关山1985年5月发现于阳新木港镇木港街，制作者：陈木莲。



《七仙八卦》，尹关山1985年7月发现于阳新大德乡杨柳村欧湾，制作者：柯木香。

返回县城后，尹关山马不停蹄地开始工作，一方面搜集资料、咨询专家，确定阳新粘花是否为他首次发现；另一方面，开始着手提炼其基本特征和艺术特色。同时，他推动县文化馆召开专题会议，邀请全县18个乡镇文化站站长参加，现场参观粘花实物展览，一举拉开了大面积搜寻的帷幕，此后共搜集到阳新粘花实物千余件。

由于尹关山的慧眼识珠，阳新粘花终于向世人撩开神秘的面纱，其实用体系丰富、造型不落俗套，在色彩、构成上凸显出浓郁的楚文化印记。

阳新布贴走出阳新

尹关山认为，阳新粘花是楚文化在黄石地域的一个奇特结晶，有着丰富的文化意蕴，要让全省、全国甚至世界都知道。但是，要让阳新粘花走出阳新，为人所熟知，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严谨认真的尹关山，挑灯夜读，深入研究。他觉得阳新粘花不足以表达其本质内涵，于是将其改名为“阳新布贴”，并重新

进行定义：系刺绣的一种形式，利用做衣被剩下的边角碎料，在黑色或深蓝色的布料底布上精心拼贴成五彩斑斓的图案，用浆糊贴牢后，再用针线沿边锁绣。此定义得到了湖北省民俗专家认可。

尹关山对阳新布贴的内涵进行纵深分析，并与我国其他的民间布贴作横向比较，发现阳新布贴面布多呈黑色和铁蓝，里布衬以红色，贴花布多现鲜亮的原色、晕色甚至黑白极色。面布与里布的一黑一红，面布与贴布的黑地起色，恰好印证了楚地民间美术钟爱黑红二色和黑漆点金的传承流风。它造型野逸质朴，构图浪漫，不拘时空，天上人间，不拘常理，随意组合。

阳新布贴在制作上精工细绣，纹样众多，形成了丰富的体系，从冠至履，从童装到玩具，从新娘婚嫁用品到妇女家用，以及庙堂蒲团、吊幡等，实用物具达5系30余品种。作品多取材于民间故事、戏曲人物、民俗风情和乡间景物，如观音坐莲、凤戏牡丹、福寿八宝、金鸡鲤鱼、桃榴茶兰等。也涉及日常生活、农作物产和山林水泽等，无

需谱本，不须用笔，心象所至，信手拈来，从不雷同。

心有底气天地宽。1986年，尹关山带着阳新布贴首次亮相湖北民间美术展览，省博物馆一次性收藏了80多件，“阳新布贴”一词也被收录进《湖北省民间美术探源》一书。1987年，“麒麟踩八宝”壁挂件问鼎北京第一届中国艺术节，《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文化报》等媒体争相对阳新布贴进行报道，称之为“神奇的东方特有艺术品”。1988年《中国文学》英文版首次将阳新布贴的专题文章和一组彩照向海外传播。1990年版《中国民间艺术大辞典》“布贴”辞目中，着重介绍的地方布贴仅阳新布贴。

1989年起，阳新布贴多次漂洋过海，出展苏联、塞浦路斯、利比亚等国家和地区。2008年6月7日，民间绣活阳新布贴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阳新布贴成为一块熠熠生辉的国家级名片。2023年6月1日，湖北省民间文艺家协会根据创建、评审结果，批复命名阳新县为“湖北省布贴文化之乡”。

阳新布贴由此走出阳新，走向世界，被世人所知晓、欣赏与喜爱。

在传承中不断创新

为保存和记录阳新布贴的珍贵实物史料，自1985年至今，尹关山持续积累阳新布贴的原始资料，包括原始文字记录、手绘实物图谱、民间艺人照片、实物照片、



《麒麟踩八宝》壁挂，尹关山整理设计，1987年阳新县文化馆制作



《招财童子》壁挂，尹关山设计，1994年阳新县太子镇制作组制作



《金猫捕鼠》笔插挂袋，尹关山设计，其弟子胡芳制作，2013年参展第十四届中国工艺美术大师暨国际艺术精品博览会，获铜奖。



《因不怕》壁挂，尹关山设计，其弟子宋桂梅制作，2016年5月获湖北杂技金菊奖·首届绝技绝活展演铜奖。

工作照片、研究文稿、媒体报道等，摞起来有一人高。

他优选出阳新布贴“八个步骤”：剪裁底布、剪花样纸、剪粘色布、组合定位、绕边缝饰、辅助刺绣、复里包边、整体完成，该工艺流程成为传习重要内容。他提炼出阳新布贴“寄托母爱、相传不息，依存民俗、广为渗透，题材传统、兼容地方，造型稚拙、构成浪漫，色彩浓烈、黑漆点金，用材土俗、原始质朴，辅以刺绣、做工精细，紧贴使用、体现丰富”的八个基本特征和艺术特色，进入布贴培训教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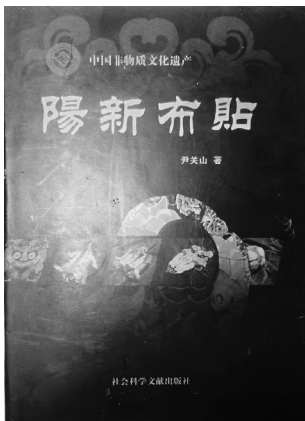
进入新时代，尹关山认为，阳新布贴既要守住精华，同时还要谋求创新。一直以来，阳新布贴不是以一种纯艺术品流传于民间的，如今它所依附的实用价值已不复存在。为此，数十年来尹关山一边继续升华原有实用样式上的传统图式，一边不断进行纯艺术样式创新工作。将中国民间文化题材植入阳新布贴图谱中，利用传统手法表现时代新内容，利用传统元素

创造现代实用物品，创作出了一批既可以走向市场，又使阳新布贴焕发出新的生命力的作品。

尹关山创作的阳新布贴作品参加过数次国展和出国展，也获得了许多奖项与荣誉。但尹关山认为，获奖不是最终目的，如何传承好阳新布贴，才是历史赋予他的重要责任。为此，尹关山做了许多努力，相关部门也给予了大力支持。

一是著书立说。为了系统整理阳新布贴这一珍贵文化遗产的相关资料，尹关山决定为其著书立说，以传承后世。为帮助尹关山解决出版费用的问题，黄石市文联将阳新布贴与阳新采茶戏、阳新民歌打包成“阳新三宝”，作为湖北省文联“一县一品”项目申报成功，获得30万元奖励资金，使得他撰写的《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阳新布贴》（理论卷）、《湖北最美·阳新布贴》（图说卷、图谱卷、文献卷）先后顺利出版。

二是开展宣讲。尹关山被湖北师范大



尹关山先生的著作



尹关山在湖北师范学院美术学院讲课

学美术学院聘为客座教授，定期为大学生授课，多次到湖北理工学院、黄石艺术学校等大中专院校开办专题讲座，让高校学生领悟到阳新布贴的独特魅力。近年来，在尹关山的推动下，阳新布贴不断进景区、进校园、进社区、进企业、进军营、进农村，越来越多群众深入了解非遗传统文化，沉浸式感受中国非遗传统文化的匠心。

三是带徒传承。阳新县文化馆是阳新布贴传承保护单位，尹关山积极协助该馆建立四级代表性传承人数据库。其中，国家级和省级代表性传承人各1名、市级代表性传承人4名、县级代表性传承人29名。作为国家级代表传承人，尹关山亲自带徒30余人。这些徒弟在他的认真指导下，逐渐成为阳新布贴传承的骨干力量，其中1人被评为省级传承人、10人被评为市级传承人。

为普及布贴传统文化，当地建成阳新布贴展示馆。该馆常年展示布贴实物464件，其中收集民间布贴实物347件，复制传统作品57件，文创作品60件。此外，还着力打造活态文化空间，设立30个阳新布贴传承点，在阳新县乡镇、社区实现全覆盖。两个主要传承点设在文化馆内，其中，阳新布贴

传习所有从事阳新布贴保护在编在岗人员14人，常年为美术专业高校学生、布贴传承人、布贴爱好者、布贴文化研究者等人群提供传统技艺辅导、布贴文化交流和培训实践等服务；阳新布贴工坊，扶持首家阳新布贴民营企业——湖北鸿运工艺品股份有限公司，从事阳新布贴文创产品的开发、制作、销售等。

尹关山的家庭并不富裕，但他毅然把湖北省财政拨付的民间工艺技能传承大师专项补助资金15万元全部存入银行，用以设立阳新布贴奖励基金，两年一届，借助阳新布贴艺术节活动之技能大赛，奖励从事阳新布贴传承工作的优秀人才和优秀新作。

尹关山发现并推介了阳新布贴，阳新布贴也成就了尹关山。他先后被评为“湖北省工艺美术大师”“湖北省民间工艺技能传承大师”，荣获“湖北省首届十佳民间文化守望者”提名奖。

非遗需要保护，文化需要传承。在近40年的生涯里，尹关山先生早已将自己的事业与生活融入到阳新布贴的传承之中。他将阳新布贴从大山深处发掘出来，使其重现流光，在绚烂的文化遗产中绽放着独特的光辉。

吕永超，黄石市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副主任

仁和精诚护民安 双岗履职展风范

◇ 李智杰

人物名片：李智杰，市政协常委，市中医院医院主任医师，湖北中医药大学特聘教授。

三十多年的中医历程，十余年的委员生涯，双岗履职在我这里已经成为一个习惯。我十岁开始习医，有幸传承家学。家父将横渠四句相赠，毕生作为座右铭：“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精修中医医术，守护群众健康

作为一个中医，上以疗君亲之疾，下以救贫贱之厄，中以保身长全，以养其生。关心民众疾病，守护群众健康，一直是我不懈的追求。

我自幼受父辈熏陶，热爱中医药文化，在多年的求学生涯中打下了扎实的中医理论基础。从中医学院毕业后，我从事老年病及中医脑病相关工作 30 余年。多年行医，我积累了较为丰富的临床经验，不断结合

医院现状和患者的实际情况，转变自己的思维和诊治方式，使得治疗工作更有意义和价值。

我曾专心研究血管性痴呆八年，取得一定成效。但后来发现，当患者患上痴呆后，治病的依从性普遍较差，加上经济负担重、治疗周期长，往往得不到规范治疗，也缺乏信心。在结合实际情况认真思考后，我觉得应当把关口前移——从治疗痴呆转移到预防痴呆。这一理念的改变，使我的研究重点落脚到最容易引起痴呆的失眠和认知障碍（记忆力下降）上，对治疗工作起到了极大帮助。

我每周有五个半天的专家门诊，诊务虽繁忙，但我对每个患者都尽心医治，四诊到位，临床疗效比较好。特别是对于疑难杂症，通常会运用多种中医手段进行治疗。如肠道克罗恩病，现代医学几无办法，病发则手术切割一段溃疡的肠组织，病再发再切，病人痛苦不堪。而我则采用纯中医治疗，疏肝和胃护肠，往往收获满意疗效。还有一些

皮肤病难以治愈，我通常配合使用中药药浴之法，见效快捷，内外合治更能持久。所诊失眠患者，多因社会快速发展带来的压力过大，我以升降之法治之，配合适当的心理调适，有效率达到80%以上。

对于在多处治疗后效果仍不好的患者我尤为关注。2018年接诊过的一位14岁昆明女孩，因感冒发烧咳嗽，长期低热，在当地多家医院检查、治疗都无果，几经折腾，女孩的身体愈发虚弱。其父带她去北京大学第三医院住院半月，依然没有疗效。后来到武汉寻医，挂上了我的专家号。我仔细查看了他们带来的厚厚一大摞住院病历及检验报告，耐心地诊察病情并处以方剂，最后开出7剂药，只花费175元。回家服药一周后，孩子身体状态明显好转。

一周后，他的父亲通过微信联系到我，我略微调整方剂续服一周后，孩子身体状况大为改善。女孩父亲专门写信向我致谢，信末写到：“治病救人，济世于众，乃医之大德。医术高超，医德高尚，不为世俗所污浊，不为利益所熏心，是我在李院长身上所见之实。”

病患家人的溢美之词，实愧不敢当。治病救人，济世于众，的确是我作为一名中医的初心。而高超的医术和高尚的医德，更是我作为一名中医永恒的追求。

积极建言，让老百姓吃上“放心药”

在尽心本职工作的同时，我充分履行政协委员的职责，积极在政协平台建言献策，推动中医药事业的积极发展。



在湖北南漳进行义诊

中医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杰出代表，但当下“黑”中医之声时有泛滥，中医药事业参与全民健康后继乏力。通过充分查阅资料和参与调研，我发现了中医药事业发展中存在的一些问题。

如：中医药未被完全纳入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防控法律框架体系，对其防治疫情的作用重视不够，在整体应急机制中的参与度较弱；中医药防治传染病的机构建设不够完善，缺乏专门的中医传染病医院，中医医院的传染病科建设和传染病医院的中医科建设不足，中医医疗机构发热门诊及肠道门诊建设滞后，中医防控传染病的临床研究基地及实验、数据支撑平台建设不足；本地中医药防治传染病的训练缺失，院校教育及继续教育阶段对中医防治传染病教育重视不够，人才队伍严重缺乏，等等。

有鉴于此，我向市政协全会提出《关于充分发挥中医药在重大疫情防控中的作用的建议》提案，并就此议题与市领导开展对话，受到市领导重视。

中医药是我国的国粹，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中医药事业的继承发展与应用，强调“中医药是中华民族的瑰宝，要保护好、发掘好、发展好、传承好。”中医、中药密

不可分，中药就是中医同疾病争斗，保障人民身体健康的武器，中药更是中医药宝库中的精髓。

但目前，中药饮片的质量监管上存在着诸多问题，严重影响和制约着中医作用与功能的发挥，其中质量与价格又是问题的焦点。中药饮片市场量大，但品种混乱，不重视质量以假充真、以劣充好、以次充优的现象十分严重。中药饮片的质量直接关系到临床疗效及人民群众用药的安全有效，直接影响到老百姓对中医药的信任。但中药饮片种类繁多，各地使用习惯有同有异，通用名称古今延更，加之一些商贩的不法行为，导致饮片市场较为混乱。因此，科学监控中药饮片质量尤为重要。

我由此提出《关于加强我市医疗机构中药饮片质量监管的建议》提案，直接推动市药监局开展中药饮片质量大抽查并举办中药从业人员培训班。随后武汉市中医医院组织编写的《药材和饮片选用指南》（湖北科技出版社2020年出版），作为武汉地区医疗机构（含零售药店）采购、验收、销售的质量依据。规范行业行为，加强行业管理，提升中医药服务能力水平，提升社会满意度，努力为人民群众提供质量更好、疗效更佳的中药饮片，让老百姓吃“放心药”。

不遗余力，传承中医传统文化

中医不仅是一门医学，它还是一种文化，一门哲学，但人们对其基础知识普遍缺乏了解，这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断层密不可分。如何更好地传承中医文化，推动中医复兴，是历史赋予我们这代中医医生的重要责任。

有感于此，我经过一段时间精心准备，

组织了十二门中医科普课程，向大众进行宣讲。尤其是《告诉你一个真实的中医》报告，已经连续宣讲了八年，听众逾万，反响热烈。

在省、市、区政协会议上，我提出了兴建中医药博物馆建议，建言成果被纳入湖北省《关于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的实施意见》《“十四五”中医药发展规划》。今年，我执笔的《关于促进我市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的建议》，又被列为重点提案。

此外，历经二十余年的整理，从18万份老中医医案中精心选择2000份，出版百万字专著《临床实录》；主编《老年期痴呆》一书，由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出版。

作为湖北中医药大学博士生导师，我前后招收了20多名硕士和5名博士。学习中医，不仅仅是在门诊中跟师习医，而且要树立正确的行医理念，先做人，后为医，重点在悟字上，赓续正统中医。

我要求学生四大经典熟读悟透，对名家流派知根溯源，对典型病案明理思辨，对老师经验举一反三。已毕业的学生们渐成所在单位的骨干人才，尚在苦读的学子们已是百尺竿头更待进步。为师者，因同学们的快速成长而开心自豪，为中医药事业着力培养栋梁之才义不容辞！

如今，站在政协这个聚力聚智的平台上，感觉自己有劲使得上，有力发得出，双岗履职，仁和精诚。我相信，中医一定会复兴，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一定会复兴！

“用心做光”让城市生活更美好

◇ 杨冬梅

人物名片：杨冬梅，江苏宿迁人，凯美瑞建设工程（武汉）有限公司董事长，武汉市政协委员、市工商联常委，湖北省女企业家协会副会长。

夜幕降临，华灯初上。一盏盏路灯灿若星辰，一栋栋建筑穿上“彩衣”，璀璨的灯光展现着武汉独有的城市活力与温馨。我走在街头，看着这变化万千的灯光，心中一股自豪感油然而生。在这璀璨灯火背后，有着我和团队的一份努力。

我从事照明工程17年，带领凯美瑞建设高质量完成武汉及全国多个照明项目。未来，我将坚持使命和愿景驱动，“亮一座城，筑一道景，让城市生活更加美好”，把凯美瑞建设这盏“阿拉丁神灯”带向更广阔的蓝海。

用“光的生机”温暖都市“夜归人”

一座城，最大的魅力不是白天，而是夜晚。

夜幕降临，城市灯光闪亮登场。在我眼里，每一道光都有它的意义，它们让武汉

亮起来、美起来、建筑“活”过来、夜间经济“火”起来，也温暖了在这座城市生活的每一位“夜归人”。

每当我回忆起自己与光结缘，踏入城市照明行业并为之奋斗坚守的岁月，都会想起人生中漫长黑夜曾被点燃的两盏灯，它们历经了岁月，穿越时空，依然闪烁着光芒。

我从小在江苏宿迁农村长大，晚自习放学回家，都要独自走一条长长的田埂路。一边是稻田，一边是半人高的棉花地，没有路灯，只能靠着月光前行。一路上胆战心惊，直到远远看见家门口那盏亮着的灯，才定下心，那是父母为自己留着的一盏灯。那盏灯，对于年少的我，意味着回家路上的指引和温暖。

2020年初，武汉经历特殊时刻，白天街道空旷寂寥，晚上夜幕降临，灯光如约亮起，看着窗外闪烁的灯光，我第一次觉得自己的事业如此有意义，这些充满希望的“微光”背后也有着凯美瑞建设的一份力量。那盏灯，对于中年的我，意味着事业征途中的生机和坚定。

1999年，我从宿迁老家来到了武汉，选择城市照明作为创业方向，创立了凯美瑞



2019年1月武汉第七届军人运动会主媒体中心场馆景观提升项目

建设工程（武汉）有限公司。17年来，以光为笔，不断创造光之“佳作”。本着“满足所需，超出所望”的“利他”服务理念，将公司打造成一家集城市景观照明规划设计与施工、建筑装饰设计与施工、机电设备、电子智能化自主研发及运用一体化的综合性高新技术企业，并取得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厅核准的城市及道路照明工程专业承包壹级资质、照明工程设计专项甲级资质等相关十八项资质。公司承接的项目荣获了“中照奖”“金手指奖”“阿拉丁神灯奖”“中国景观照明工程奖”等行业最高殊荣。

以“光的智慧”助力城市品质升级

10月8日，在晚霞的映衬下，武汉光谷某大厦幕墙的灯光亮起，让这个秋天有了一丝暖意。这栋大楼通过 LEED 绿色建筑认证，不仅使用灯光营造出更加健康舒适的办公环境，并且所有灯光都使用了量身定制的节能 LED 照明产品。这些量身定制的 LED 照明产品，在同样亮度的情况下，节能从 70% 提升至 85%。整栋大楼的灯光设计与施工正是我们公司。

作为 LEED 绿色建筑认证，大厦运营

方对照明灯具节能规范提出标准：采用既节能又环保的 LED 照明灯具，外立面照明功率密度不得超过 $1\text{W}/\text{m}^2$ ，行业常规一般在 $2.5\text{W}/\text{m}^2$ 以上。

筛选到合适的供应商后，又历经数轮优化实验，确定好灯具的配光、亮度、光色等多个参数设定，打样、测试、修改，历时 6 个月，最终完成封样，安装运行后，运营成本大大降低。

灯光可以安装“聪明”的大脑。博物馆的展台上，不论是核桃大小的茶杯还是口径大于 50 厘米的铜鼎，展台顶上的灯光均可以自动调节光圈半径，随着展品大小自动变化，为展品增添“光彩”。目前这种可以切换照明范围大小的照明灯具已经取得专利。作为高新技术企业，凯美瑞建设拥有近 20 项实用新型专利、计算机软件著作权。

“生活向美，未来向光”，未来我们将立足国家“双碳”战略，依托深耕照明多年的经验，用更先进的照明科技，赋予光更亮更远的前瞻视野，打造健康舒适的照明环境，引导绿色低碳的灵动空间，为消费者带去智慧新体验，推动智慧照明不断可持续发展，为智慧城市建设提供新动力。

以“光的力量”照亮女性创业之路

我除了担任凯美瑞建设董事长外，今年 9 月，又增添了一个新身份——武汉大学 EMBA 学生。

在我看来，一个企业家的学习能力决定了企业的命运。在当今的商业环境，平均每 2—3 年就会产生一个新生事物。如果不快速更新思维，跟上创新脚步，很容易将企业经营的优势转变为劣势。所以我选择重回校园。

女性创业极其不易。女性创业不仅需要坚韧不拔的意志，更需要有高贵的品格、博大的胸襟。在创业这条路上，没有所谓的“女士优先”，只有自己强大才能坚持到最后。永远别指望在屋里吹空调，员工帮你卖命。老板永远是冲在最前面的那位。员工不想听你怎么说，只想看你怎么做。他们认可你了才会跟随你。

大家评价我是一个激情满满的追光人，出于对事业的热爱，在企业管理上我坚持柔性管理，并永远全力以赴。照明施工有时在深夜进行，为了掌握进度和把控质量，工地里、项目上，我全程参与到沟通、设计、施工等环节，关注项目细节，并对项目最终效果负责，让客户对合作省心、对过程放心、对效果动心。累了就去车里打个盹，十几分钟后又精神抖擞回到现场。

对于“90后”“00后”员工，我又像知心小姐姐般常常叮嘱：没有工作的时候一定要学习，多看书，公司给大家一个平台，不要轻易躺平内耗。

在我手机里，收藏最多的不是自拍，而是数千张全国各地经典“灯光佳作”。每当我披着夜色回家，有路过我们公司承接的项目，我都要停下来看一眼，它们在黑暗中照亮我回家的路，我也希望做别人黑暗中的那束光。

以“光的温暖”开启企业责任担当

我带领凯美瑞建设参与点亮这座城市的，不只是照明工程，还有爱心善举责任担当。

在汉口新界广场小区2栋1楼，一间崭新、温馨、充满书香气息的老年活动中心给社区居民带去悠闲时光。



凯美瑞建设工程（武汉）有限公司董事长杨冬梅

身为江汉区人大代表，2022年我走进万松街道航空社区接待选民、听取居民意见，针对居民提出的新界广场老年活动中心缺少改造资金、建筑村35号院子下雨淹水、天然气安装难等问题进行详细调研。

针对新界老年活动中心改造建设问题，我立即协调资金并出资进行设计和施工改造，仅仅一个半月的时间，老年活动中心便如期建成；而让社区居民烦恼的下雨淹水问题，我也向人大街道工委提交《关于改造建筑村35号地下排水管网的建议》，对问题进行跟踪督办，最终解决了社区难题。

身为武汉市政协委员、武汉市工商联常委、湖北省女企业家协会副会长，我一直积极践行社会责任企业担当：带领公司工会小组委员，深入结对贫困户家中了解其目前生活状况，每年帮扶农民工百余人，为农民工提供就业岗位或基本生活物资。2020年7月湖北武汉抗洪防汛期间，我带领员工前往抗洪防汛一线，为防汛一线人员送去防汛物资。2021年7月河南发生特大暴雨水灾时，第一时间向河南慈善总会银行转款捐款用于防汛救灾。2022年向武汉市慈善总会捐赠5万元，为青少年抑郁症心理健康提供康复服务。

杨叔子院士当参事

◇ 吴远舟

落叶飘零之际，华中科技大学老校长杨叔子院士已辞世一周年了。这位著名机械工程专家和教育家，一生任职众多，但他当过武汉市政府参事并认真履职，却不大为人所知。

杨叔子院士首次担任市政府参事是2006年，5年任期届满后又续聘3年。起初向他征求意见时，他欣然应允：“作为在湖北、在武汉生活了50多年的我，从19岁来武汉读大学的青年学生成长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对武汉这个第二故乡怀有深深的热爱之情，很愿意为武汉的发展尽绵薄之力。”

提出“打造八城”设想

杨叔子院士担任市政府参事之时，正值国家提出实施“中部崛起”战略的第二年。

武汉该怎样找准自己的发展位置，怎么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他已经进行了深入思考。在市政府领导参加的参事工作座谈会上，他提出：武汉市在抢抓发展机遇、促进跨越式发展、实现中部地区率先崛起中，应着力提升文化软实力，引领现代化城市文化发展方向。

杨叔子院士从总体上分析说，武汉文化软实力建设具有一定优势，有颇具潜能的人文基础、悠久连绵的历史文化遗存、群星荟萃的名人文化及民间文化艺术等，新闻出版、广播电视、文化娱乐、旅游、体育等优质文化产业也发展较快。但是，市民素质有待提升，城市建设缺乏文化内涵的进一步发掘和文化资源整合。

杨叔子院士研究了国外大都市重视文化软实力建设的情况，一一作出介绍：伦敦



2006年1月，武汉市市长李宪生在参事聘书颁发仪式上与杨叔子握手

成立专门的品牌推广机构，注重媒体传播和活动造势。纽约在“9·11”事件之后，一是通过城市“复兴”计划，大力发展广告创意和文化产业等“象征经济”，使城市重新充满活力，成为全球“象征经济”的策源地；二是聘请专家设计出以“大苹果”为图案的旅游标志，向世界展示异彩纷呈的城市形象；三是大力宣传承担城市基础安全保障工作的普通消防队员，向外界展示普通市民敬业履责、勇于承担的品质。巴黎，作为公认的世界文化艺术之都，每年举办来自全球的文化艺术展、图书展、文化演出活动和大型体育赛事，宣传文化多样的城市形象和包容性人文特质。

为此，围绕如何借鉴国外大都市的做法，杨叔子院士提出四点建议。

第一，政府高度重视、市民广泛参与。在认识上既重视公共文化设施建设，又注重文化产业发展。从战略制定到活动方案实施，都要有明确的目标和周密的安排。要利用一切渠道向广大市民广泛宣传，使他们清楚了解推广城市形象的重要性，让市民从自己做起，人人都成为城市形象的创造者和传播者，把推广城市形象作为日常工作和生活中的文化自觉。

第二，利用专业机构打造城市形象。

确定专门的设计机构对城市形象理念、行为和视觉进行系统设计，制定详细的推广方案，力求让社会在第一时间产生共鸣。

第三，整合多种方式提高传播效果。重视平面和电子媒体的整合、多语种的整合，提升媒体的渗透力和传播力，重视利用旅游这个“流动的文化”来广为传播城市形象。

第四，举办节庆、赛事活动，扩大城市影响力。

对于提升文化软实力，杨叔子院士持续关注，不断建言。2011年9月，他与湖北省建设银行副行长张进等经过充分调研和多次讨论，向市政府重点提出三个方面的建议。在建立“大文化”建设机制、制定“文化发展纲领”的前提下，特别强调“发掘文化特色，提炼文化精神”，提出打造“八城”的设想，即：依托水文化生态特征，打造环境优美的“秀水江城”；依托楚文化历史特征，打造恢宏大气的“文化名城”；依托辛亥首义文化特征，打造爱国主义的“首义红城”；依托革命文化特征，打造波澜壮阔的“革命名城”；依托教育实力特征，打造重学重教的“学府重城”；依托科技实力特征，打造科山技海的“科技名城”；依托惟楚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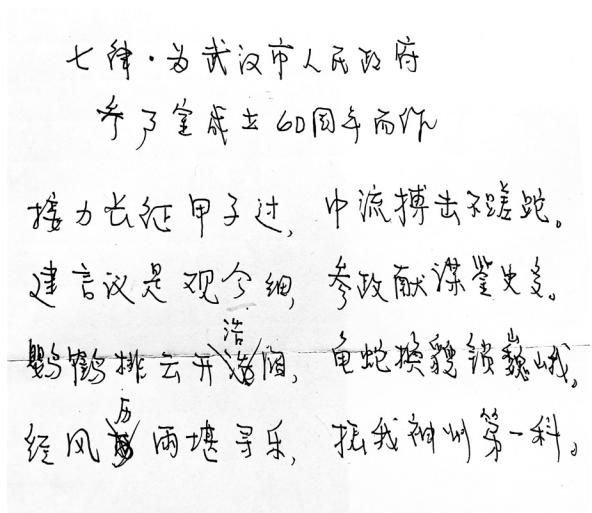
2009年9月，杨叔子在“大家讲坛”演讲

才特征，打造惜才留人的“聚贤宜城”；依托商业繁荣特征，打造重信守诺的“诚信商城”。由此重点打造楚文化品牌、革命文化品牌、历史文化品牌、自然文化品牌等四大品牌，每年集中财力、物力办好武汉国际杂技节、武汉渡江节等具有武汉特色的大型文化活动。

这些建议受到市领导高度重视，批示给有关部门办理，为武汉市文化软实力提升提供了重要决策参考。

建言“世界工程设计之都”申报

杨叔子院士认为，文化产业是现代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朝阳产业。武汉市作为文化大市，有着丰厚的文化积淀和强大的科技力量，有着独特的自然优势与历史优势，有着坚实的工业与农业基础，要深入挖掘利用历史文化资源，实现文化产业与旅游产业相互促进、融合发展。将文化产业作为经济战略重点，加大投资力度，支持动漫、服务外包、工程设计等文化产业发展，力争向千亿元产业进军。



2010年4月，杨叔子赋诗手稿

2006年8月，在市政府参事室举办的“强化自主创新促进武汉崛起”研讨会上，杨叔子院士指出，“中部崛起”与“长江产业带发展”之“交”就是湖北武汉。武汉龙头的高昂，一定要将文化建设、文化产业放在足够重要的战略地位。经济建设与文化建设不仅密切互动，而且紧依互融，即经济建设中有文化建设，文化建设中有经济建设。文化产业建设既是文化建设也是经济建设，文化建设中必须有文化事业建设与文化产业建设，不可缺一。杨叔子院士直言，据有关部门统计，当年武汉文化产业增加值占全市GDP约为4.7%，而京、沪、穗均已超过6%，工业发达国家更是达到20%左右，可见武汉文化产业发展潜力巨大，发展前途十分广阔。

2011年1月，在市政府参事室召开参事课题讨论会上，杨叔子院士提出，近年来国内外经济发达城市都将文化产业作为地方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上海在10年内将文化产业总投入从400万元飙升至200亿元以上，武汉除大力发展公益性文化事业这一基础性文化工作之外，要把文化产业发展提到带动国民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升级的战略高度，加大文化产业投入，增强文化辐射力、带动力。

同年8月，杨叔子院士与中建三局原局长洪可柱、湖北省建设银行副行长张进、中铁大桥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梅权等，在一次集中学习中碰撞出火花：2009年至2011年，武汉市政府工作报告连续三年提出将武汉市打造成为“工程设计之都”，工程设计是武汉市的强项，武汉工程设计拥有多项世界第一，产业规模全国领先，产业门类齐全，产业配套环境良好，产业人才资源丰富，但缺乏以工程设计引领城市转型的城市战略

与新视野、新模式和新路径。为此，他们共同向武汉市政府建议：通过申报世界工程设计之都，促进武汉工程设计之都建设。

第一，积极开展“申都”工作。根据评选标准和武汉市现实条件，借鉴已获批的上海、深圳等城市“社会组织为主体、政府强力推动”的经验，以武汉工程设计联盟或勘察设计协会为实施主体，政府相关部门为成员单位，成立“申都”领导小组负责总体协调。

第二，强力铸造国际城市名片。走国际化与市场化之路，争取和加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设计协会对武汉工程设计产业的认可和认同；主动与取得称号的国际、国内城市建立合作机制；由政府、社会组织与工程设计企业联手，不定期举办以“世界设计大会”“工程设计产业”为主题的高层论坛、博览会、双年展和设计比赛，提高工程设计产业影响力。

第三，大胆探索产业融资模式。设立政府产业引导基金。将市城建、市交通经费中的科技经费，市科技、市发改等部门的专项经费进行整合，分别设立创投和担保基金，由工程设计产业联盟企业集体出资，形成规模为2亿左右的种子基金，市场化运作形成放大种子基金规模5—10倍、约20亿左右的资金扶持产业发展。

第四，率先建立全国工程设计产业交易平台。逐步吸引国内外规划设计机构参与交易，争取成为全国工程设计交易中心。

第五，尽快形成产业示范高地。把设计理念、成果，由产业和产品设计领域扩展运用到城市规划和城市建设之中。

申报“世界工程设计之都”的建议，得到市长唐良智的充分认可和批办，为武汉2017年正式入选“全球创意城市网络设计



2010年6月，杨叔子（前排左一）等调研国家重点光电实验室

之都”、激发武汉设计产业飞跃式发展发挥了重要助推作用。

领衔优秀历史建筑课题调研

优秀历史建筑作为历史文化延续的重要物质见证，是历史文化名城的生动载体和记忆传承，不可再生，难于复制，具有独特魅力。杨叔子院士对其非常关注，多次呼吁加强保护。

2011年下半年，经过市政府参事室策划，由杨叔子院士领衔成立重点课题调研组，中建三局原局长洪可柱、武汉市城建委总工程师龙世平、武汉市林业局原副局长吴银莲、江夏区委原副书记程贤华、武汉理工大学教授彭少民等参与，历时3个多月，先后走访市房管局、文化局、国土资源和规划局、城建委、园林局、民宗委、江岸区房管局等单位，实地查看东方汇理银行、涂塋山公馆、咸安坊等优秀历史建筑，全面掌握了武汉优秀历史建筑保护所做的主要工作和取得的成效，同时梳理出保护意识不强、管理体制落后、法规体系不全、资金投入不够等问题，向市政府提出六个方面的建议。

第一，健全法规政策制度体系。借鉴上海、天津等城市成功经验，通过规定程序和权限，将《武汉市旧城风貌区和优秀历史建筑保护管理办法》上升到法律层面，使保护工作更具权威性强制性；尽快制定出台优秀历史建筑腾退、产权转移、专项资金筹集等管理办法，保证优秀历史建筑保护工作有序开展；建立严格的优秀历史建筑保护、审批、规划避让、特别论证等制度，从制度上扼制随意拆除优秀历史建筑的倾向，避免其在城市建设开发改造过程中消失。

第二，强化完善统一高效的管理体制机制。一是强化管理机构，进一步发挥市历史文化名城暨优秀历史建筑保护委员会、优秀历史建筑专家委员会的作用，充实和加强优秀历史建筑保护办公室力量，统一负责全市优秀历史建筑的保护工作，做到专人专职专岗专事，并将市园林局、总工会独立管理的优秀历史建筑纳入全市管理体系。二是明确保护对象为整个优秀历史建筑领域，包括优秀工业建筑与民用建筑。三是划定锁定保护范围，包括远城区在内。四是确立保护方式，分类进行抢救性、修缮性、管理性、利用性保护，积极利用，依法严管。

第三，编制完整科学的保护规划。尽快完成全市优秀历史建筑资源与状况普查工作，全面准确掌握基本情况，把保护规划的具体内容融入城市发展总体规划之中，对优秀历史建筑维护、修缮等工作，列出轻重缓急，科学合理安排，报经市人大、市政府批准施行。

第四，多渠道融资并做到专款专项专用。采取“政府财政预算拨款+社会单位与个人捐赠+经营收入+社会单位个人投资”的筹措模式，引入社会力量进行保护、开发和利用。

第五，加强专业化队伍建设和做好城市发展有序承传工作。尽快组建一支高资质的设计、施工、保护专业队伍，多方面适应和满足古建筑保护需要。同时，城市建设发展项目，从规划、设计、施工上严格把关，尽量与相邻的优秀历史建筑风格相协调。

第六，动员全社会力量广泛参与。采取多种形式，宣传优秀历史建筑保护的政策法规和基本常识，提高市民的参与意识和积极性。全面推行与建筑所有者或使用“签订保护责任书”，在所有历史风貌区、历史地段、优秀历史建筑与“文保”单位周边实行“四包（卫生、绿化、交通、治安）”责任制，做到奖惩结合。

这次重点课题调研，是杨叔子院士参加课题调研时间最长的一次，给课题组成员、市政府参事室领导和工作人员留下深刻印象。

杨叔子院士8年履职参事，一如他一生卓有成效的教学科研工作，也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记得，2010年杨叔子院士为市政府参事室成立60周年写过一首诗：“接力长征甲子过，中流搏击不蹉跎。建言议是观今细，参政献谋鉴史多。鸚鹄排云开浩阔，龟蛇换貌锁巍峨。经风历雨堪寻乐，振我神州第一科。”我以为，这首诗既是他对市政府参事室的衷心祝贺，也是他当参事的心迹写照。

吴远舟，武汉市政府办公厅（参事室）
一级调研员

武汉大学主校门 130 年的演变

◇ 徐应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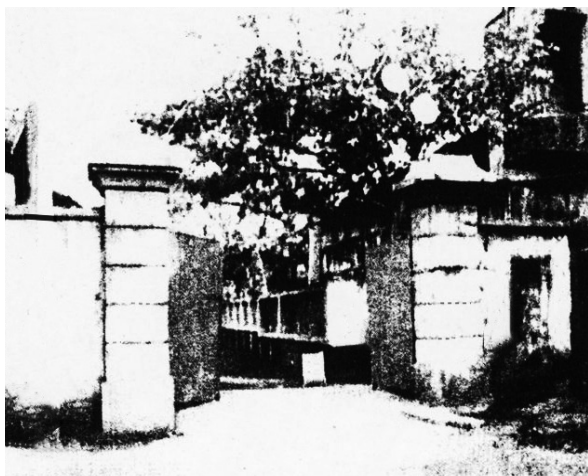
11 月 29 日，武汉大学迎来 130 周年校庆，源于 1893 年（清光绪十九年）湖广总督张之洞奏请清政府创建的湖北自强学堂。



校门，是学校的主要标志，也是了解学校发展轨迹的重要途径。在 130 年的历程中，武汉大学校名 8 次更改，校址 2 次搬迁，主校门变动多达 7 款。

湖北自强学堂校门

1893 年 11 月 29 日，湖广总督张之洞在《设立自强学堂片》中提到：“兹于湖北省城内铁政局之旁，购地鸠工造成学堂一所，名曰自强学堂。”原计划开设算学、方言、格致、商务四门。从有关历史资料得知，湖北自强学堂校址位于今武昌复兴路以西、彭刘杨路以南、读书院以北的区域，



湖北自强学堂校门（形似）

即今首义园小区（国营七四三五厂职工住宅小区）。

1902年，湖北自强学堂改名为湖北方言学堂，校址迁至武昌东厂口（今黄鹤楼公园东门位置）。可惜，目前没有考证出湖北自强学堂的真正校门。参考同期武昌城内其他大学、中学和小学堂的校门款式，自强学堂校门极有可能是一座简约的单阙门，有一对方形立柱，顶部四角攒尖，立柱与院墙衔接。

湖北方言学堂校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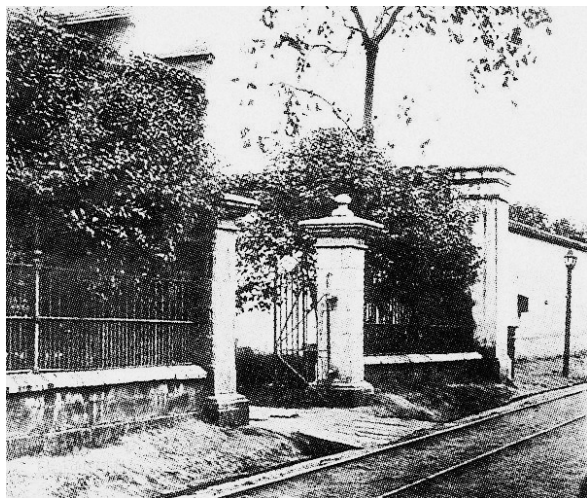
1902年6月3日，张之洞札湖北省学务处“设立方言学堂一所，以城内旧日农务局屋舍充用。即将自强学堂原有学生移入，仍另行定章，分别去留。”

农务局于1889年12月设立，与湖北农务学堂共用武昌高观山南坡的原四川会馆院落。湖北农务学堂创办于1897年10月，1899年迁入原四川会馆。因校园逼仄不适合培养农务人才，1902年迁至武昌武胜门外的宝积庵，并更名为湖北高等农业学堂。

湖北方言学堂教习英、法、德、俄、

日五门语言。1907年，张之洞在《请奖各学堂毕业生及管理教员折》中强调：“惟方言学堂原名自强学堂，开办远在定章之前。”所谓“定章”，是指1902年下诏的《钦定学堂章程》。

湖北方言学堂校园大约40—50亩。“四至”是：东毗高观书院（1910年湖北省图书馆迁入）和江夏高等小学堂，西临清军辎重营房和陆军医院，南至方言学堂路（1903年由东厂口改名而来），北至高观山的陡坡。方言学堂校门为那个时期流行的单阙门，门前有一条经宾阳门（今大东门）通往银元局、铜元局的铁路。



湖北方言学堂校门

1911年3月，湖北方言学堂因办学经费拮据而停办。辛亥革命后，武昌军官学校进占校园，黄宫变成了军营。

武昌高等师范学校校门

1912年9月，中华民国教育部颁布《大学令》《师范教育令》。1913年2月，教育部又公布《高等师范学校规程》，决定在直隶区（北京）、东北区（沈阳）、湖



武昌高等师范学校校门，约 1917 年摄

北区（武汉）、四川区（成都）、广东区（广州）、江苏区（南京）设立 6 所国立高等师范学校，北京加设 1 所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据《武汉市志》记载，1913 年 5 月，湖北省军政府议决，成立国立武昌高等师范学校（简称“武昌高师”）。

1913 年 7 月，教育部委派贺孝齐负责筹建武昌高师，筹备处设在原湖北方言学堂西侧的一栋房子，旋即任命贺孝齐为校长。1913 年 8 月，湖北省军政府飭武昌军官学校从原方言学堂迁出。

武昌高师初设英语、博物、数学物理、历史地理等四部。11 月 2 日，首届 124 名学生正式入学。1922 年，改四部为八系，即教育哲学系、国文系、英语系、数学系、理化系、历史社会学系、生物系、地质系。

初期，武昌高师沿用湖北方言学堂的校门，后期新建一座校门。第一进大门保留原有的单阙门，相当于院墙门。第二进校门为三开间穿堂门，门上挂有校牌。

武昌师范大学、武昌大学、武昌中山大学校门

1922 年 9 月，北洋政府教育部公布《学校系统改革案》（又称壬戌学制），同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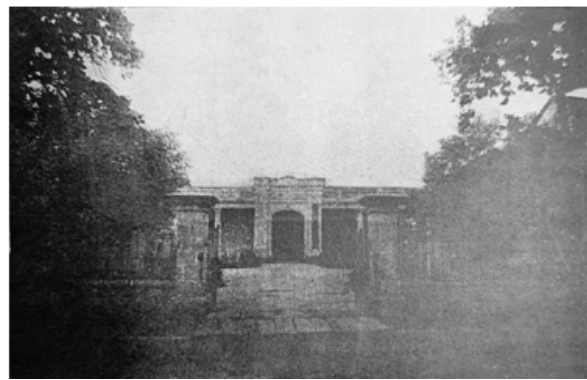
11 月颁布了《学校系统改革令》。根据这两个法令，全国的高等师范学校统一改称“师范大学”，改革学制，提高招生条件。

1923 年 6 月 11 日，武昌高师召开评议会，决定自 1923 年下学期起，将学校改名为武昌师范大学。



1923 年建成的武昌师范大学校门，1924 年初摄

根据 1924 年《国立武昌师范大学甲子级同学录》刊载的照片，武昌师范大学校门于 1923 年建成，图中校名铭牌基本清晰，学校大门依然为两进。



武昌大学、武昌中山大学校门

武昌师范大学新建的校门，体现了 20 世纪早期中西建筑设计理念融合的趋势。中国元素有：戟房五间，明间开门，左右次间，两头梢间。古罗马建筑元素有：①门廊梁柱结构，柱式为艾奥尼克（Ionic）柱，柱体修长，

少许收分，柱头装饰涡漩纹，似女性发卷。
②大门有两道，外门为券门，由廊柱和拱券合成；内门运用同心多层小圆券造型。③窗户细长，每间两扇，赋予神秘感。

1925年1月13日，北洋政府教育部再颁命令，将武昌师范大学更名为武昌大学。1926年8月底，国民政府北伐军开始围困武昌城，武昌大学因“围城”停学。

1926年11月20日，湖北省政务委员会根据广州国民政府的要求，将国立武昌大学、武昌商科大学与湖北省立法科大学、文科大学、医科大学及私立中华大学大学部合并，组建国立武昌中山大学（又名第二中山大学），徐谦任校务委员会主任。1927年2月20日，武昌中山大学举行开学典礼，孙科等中央要员出席。

武昌中山大学设文、理、法、商、医、预科等6个门类，共计17个系2个部，分3个校区办学。理科和医科设在原武昌大学校址东厂口（今黄鹤楼公园东门入口处），称为“中大一院”。文科和预科设在原武昌商科大学校址（今武昌三道街小学以西至横街之间区域），称为“中大二院”。商科和

法科设在原湖北法科大学校址（武昌贡院西院），称为“中大三院”。

武昌中山大学主校区设在武昌大学校址，主校门沿用原有二进校门。

武汉大学校门

1928年5月，国民政府大学院召开第一届全国教育工作会议，通过《中华民国学校系统》（简称“戊辰学制”），规定大学得设文、理、法、医、工、商、教、农等学院，并设专修科、研究院。

1928年7月24日，大学院决定在国立武昌中山大学基础上筹办国立武汉大学，任命刘树杞为代校长。武汉大学成立之初，沿用武昌中山大学东厂口校区和校门。

1928年8月6日，大学院决定成立武汉大学新校舍建筑设备委员会，任命李四光、王星拱、张难先、石瑛、叶雅各、麦焕章等6人为委员，李四光为委员长，专司新校区建设。

1928年11月，武汉大学新校舍建筑设备委员会勘定武昌城外东部的罗家山作为新校址，文学院首任院长闻一多教授将罗家山改名为珞珈山。

1932年2月22日，武汉大学在珞珈山开学。5月26日，举办隆重的新校址开学典礼。从此，武汉大学离开拥挤的武昌城。同时，在东厂口设立武昌办事处，管理旧校区的房产和实习工厂。

自1932年迁到珞珈山以来，学校先后4次修建



武昌中山大学三个校区在武昌城的分布



1935年武汉大学牌楼（街道口），1936年秋摄

校门，分别是：1935年款牌楼、1936年款牌坊、1993年首仿牌坊和2013年再仿牌坊。按材质划分，首款校门为木制，第二、第三款为钢筋混凝土，最后一款为花岗岩。目前1936年款校门称“文物牌坊”（位于街道口），2013年款校门称“珞珈门”（也叫“新牌坊”）。

1935年款牌楼

1935年，武汉大学在街道口建造了木制牌，由缪恩钊（结构师）和沈中清（设计师）负责设计建造。正、背面匾额上，均书写“国立武汉大学”六字（颜真卿书法集字）。

牌楼为四柱三间庑殿式，属南方牌楼风格，与武昌贡院“惟楚有材”牌楼、湖广总督府牌楼、汉阳铁厂牌楼、汉阳敦本堂牌楼等相似。明楼五脊四水，五攒斗拱；次楼三脊三水，二攒斗拱。飞檐翘角，屋面黑灰色板瓦，额枋油漆彩绘。四根立柱以抱鼓石（又称夹柱石）包夹。因牌楼纤细单薄，其稳定性不如北方带戗杆的牌楼，惜于1936年4月21日深夜被颶风吹覆。

1936年款牌坊

1936年夏，武汉大学着手在街道口原址重建校门，继续沿用古风古韵的设计思路，建成四柱三门冲天式牌坊，通体为钢筋混凝土材料，外立面为水砂石。此款牌坊，

归于文庙、贡院、书院等惯用形制，与曲阜孔庙的金声玉振牌坊、太和元气牌坊、洙水桥牌坊等相似。2001年6月，此款牌坊入选第五批全国建筑文物保护单位目录。

此款牌坊仍由缪恩钊和沈中清负责设计建造。形制简洁大方，省略了上额枋、下额枋、承露盘和朝天吼等构件，加大了匾额的尺寸。四根八棱柱挺立，柱头双层环绕16朵如意云纹，顶覆孔雀蓝琉璃筒瓦。匾额正面楷书“国立武汉大学”，背面小篆“文法理工农医”。



1936年武汉大学牌坊（街道口），2023年11月摄

“武汉大学”的书写者究竟是谁？历来众说纷纭。经过考证，先后来自三位大家。1936年9月至1965年8月，六字校名沿用颜体书法。1965年9月至1983年10月，四字校名改为1951年4月29日毛泽东主席写给1948级农业化学专业陈文新同学（后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信封上的手书（原件藏湖北省档案馆）。1993年10月至今，恢复六字校名，由湖北省书法家、画家、金石家曹立庵先生题写，底稿藏学校档案馆。

1993年首仿牌坊

为迎接建校100周年庆典和国家“211工程”预审，武汉大学决定，在八一路与



1993年9月武汉大学仿建的牌坊（八一路），2001年冬摄

珞珈山路交会处仿建街道口的老牌坊。1991年11月10日，校友总会向师生校友及社会人士发出倡议，捐款修建新校门。1992年底动工，1993年9月10日教师节前夕落成，2012年10月9日拆除，存续19年。

1993年首仿牌坊，与1936款街道口“文物牌坊”的式样和材质一样，大小也基本一致。但有四处不同：一是牌坊基座的四对抱鼓石侧面满雕梅云纹宝相花，牌坊两边各建一座门房。二是新牌坊仅作标志和象征，以草坪低栏环绕，不具通行功能。三是牌坊后5米处加建了“照壁”，正面镌刻“自强弘毅 求是 拓新”的新校训，背面刻有捐款单位和捐款人姓名。四是学校仅使用校门的东边通道，西边通道留给杨家湾的校外单位和社会居民通行。

2003年校庆前夕，学校将此款仿制牌坊命名为“珞珈门”。

2013年再仿牌坊

为改善武汉大学大门一带的环境与交通条件，武汉市政府决定在武汉大学文理学部与信息学部之间的八一路修建地下通道，使两个校区连为一体，并在地下通道顶部修建绿化广场。而1993年首仿牌坊，正好位于下穿通道的施工断面，因而不得不拆除。

2012年6月20日，八一路地下通道开工。10月9日，是拆除1993款牌坊的日子。该款牌坊虽不是文物，但拆除公告发出后引起轩然大波。有的提前拍照留念，有的诘问学校为何拆除。拆除当天，有的目击现场扼腕叹息，有的敲击键盘抒发感情，还有的捡一块残片收藏。

2013年9月8日，学校举行第二次仿建牌坊的揭幕典礼，其位置从旧址向后平移了约10米。此时正值新生开学，新牌坊以崭新姿态笑迎年轻学子。



2013年9月竣工的武汉大学牌坊（八一路），2022年5月摄

2013年再仿牌坊为花岗岩材质，石材采自福建省泉州市惠安县，通体呈芝麻白，着色素雅。面阔14.7米，通高8.4米，进深3.5米，总体是1936年款“文物牌坊”的1.12倍。四根空心八棱柱，内切圆直径72.5厘米，棱间距30厘米。柱脚与基座之间以混凝土浇筑，上部构件以卯榫拼接。檐楼及覆瓦、抱鼓石及宝相花、柱头如意云纹、正背面题字等一仍其旧。

徐应荣，武汉大学老年协会、老教授协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

汉水主泓历史上在哪里汇入长江（下）

◇ 张笃勤

八、从方志记载看明代成化初年汉水改道

据明朝嘉靖、万历两部《汉阳府志》转录明朝宣德年间赵弼所修汉阳府志稿称，汉阳古城辟有城门八处，其北门取名汉广门。我们知道，汉广典出《诗经·周南》：“汉之广矣，不可泳思”，那么汉阳城汉广门的取名无疑因临近汉水的缘故。这说明至少在明代以前，汉水就是从今龟山北面流入长江！^[1]

成化初年以前 10 年左右，即代宗景泰七年（1456 年）成书的官修《寰宇通志》卷

50 汉阳府山川条明确记载：“大别山在府城东北，汉江右。”文渊阁四库本《大明一统志》卷 59 汉阳府山川条亦称：“大别山在府城东北，汉江右”，又说“汉水在府城北五里。”该书卷 59 汉阳府古迹条亦称：“汉口在大别山北，即汉水与涢水合流入江处。”《大明一统志》始修于天顺元年，天顺五年成书，与《寰宇通志》一样都在所谓成化初年汉水改道以前。这确切表明汉水在景泰、天顺年间就从今汉阳龟山北麓入江，当代所谓成化年间汉水从汉阳城南改道龟山北麓，是对明清方志关于汉水在汉口地区截弯取直记载的错误理解。

明代嘉靖《汉阳府志·方域志》称：



清朝前期《江汉揽胜图》

“襄河在汉口北岸十里许，即古汉水正道。汉水从黄金口入排沙口，东北转折，环抱牯牛洲至鹅公口，又西南转北至郭师口对岸曰襄河口，长约四十里，然后下汉口。成化初，忽于排沙口下，郭师口上，直通一道，长约十里，汉水径从此下，而古道遂淤。”^[2]这段史料一直被当作明朝成化汉水改道说的主要依据，其实仔细推研文义，这一段话开头一句就明确指出，汉口北岸十里许的襄河“即古汉水正道。”接下来一段话陈述了汉水故道的走向，及成化初年原来在汉口地区蜿蜒曲折四十里的襄河河道截弯取直，导致汉口襄河“古道遂淤”的结果。清朝乾隆《汉阳府志》卷15《汉阳县水利考略》关于废襄河记载，与上引嘉靖《汉阳府志·方域志》大抵相同，民国《夏口县志》更照录了上述文字。面对这段历史记载，如果不是被成见蒙蔽了双眼，就不仅不会作为汉水从龟山南改道龟山北的证据，相反倒是进一步确证了“古汉水正道”本来就从龟山以北进

入长江的事实！

与古汉水正道变迁相关的是汉口后湖的形成：“后湖即废襄河旧地，北距黄陂、孝感境三十余里，东西数十里，平畴旷野，弥望无垠。”^[3]嘉庆裘行恕修《汉阳县志》卷6《山川志》亦称：“古襄河亦名后湖，乃废襄河，离汉口北岸十里许，即古汉水正道，久淤。夏秋水涨，名潇湘湖，春涸草生，名黄花地。”后湖是清代汉口风景游览胜地，曾经有“湘湖八景”之称。晚清汉阳学人胡兆春《汉阳府利弊论》称：“考后湖十里外，为古襄河地，其河道尚存，仿佛今日新沟以至沙口，由西而东，湖水落后，其沟港可通舟楫，即故河道也。”^[4]他认为大致从今东西湖区的新沟镇到黄陂县武湖的沙口这条水路，就是汉水入江故道。直到清末民初的汉口地图上，仍清晰的标注着“襄河故道”的字样及图形。留存至今的汉口后襄河公园水面，就是明代汉水故道遗迹的明证。

九、汉水由山南改山北说致误原因分析

既然如前文所述，自汉魏六朝以来就有文献和古城址证明汉水主泓从汉阳龟山北麓入江，那么为何还有学者认为汉水曾经从汉阳龟山南或汉阳城南入江呢？除了对地方志所记成化年间汉水截弯取直记载的误解，受《元和郡县志》指汉阳鲁山为《禹贡》大别山的误导，还有就是盲从宋代以后汉水由汉阳城南入江的某些错误记载。

如南宋陆游于孝宗乾道五年（1170年）从家乡山阴（今浙江绍兴）赴夔州通判任所，中途在鄂州停留：“三十日，黎明离鄂州，便风挂帆，沿鹦鹉洲南行。”他看到长江北岸有水注入，便以为“自此以南为汉水，《禹贡》所谓蟠冢导漾，东流为汉者。”^[5]大家知道，南宋时鹦鹉洲尚在鄂州城西南大江中，尾端正对黄鹤矶。陆游沿鹦鹉洲西边长江主航道南行，称鹦鹉洲以南为汉水，实际

上将汉水入江口说成了在汉阳城南。再如元代胡三省所注《资治通鉴》，几次提到“汉水与江合于鲁山西南。”这两种史料被有的学者当作在南宋、元朝汉水一度在赫山（黑山）与梅子山一带分汉，于龟山南北分流的证据。^[6]殊不知这两种记载的真实性都值得推究。

先看陆游《入蜀记》的记载。陆游是著名学者，他的记载又来自实地观察，按理说不应有错。但令人费解的是，就在陆游以为汉水在汉阳城南入江的同时，他又称“汉阳负山带江，其南小山有僧寺者，大别山也。”^[7]进而将大别山也说成在汉阳城南！如果说南宋时汉水在汉阳城南入江于情理尚存在可能的话，那么无论如何，一直在汉阳城北的大别山不可能跑到汉阳城南。更何况除凤栖山紧贴汉阳城北外，汉阳城南一带并无任何小山，亦不存在将其它山丘误作大别山的可能。假如不是陆游当时迷失方向或者后来手民将陆游原文“其北”误刻“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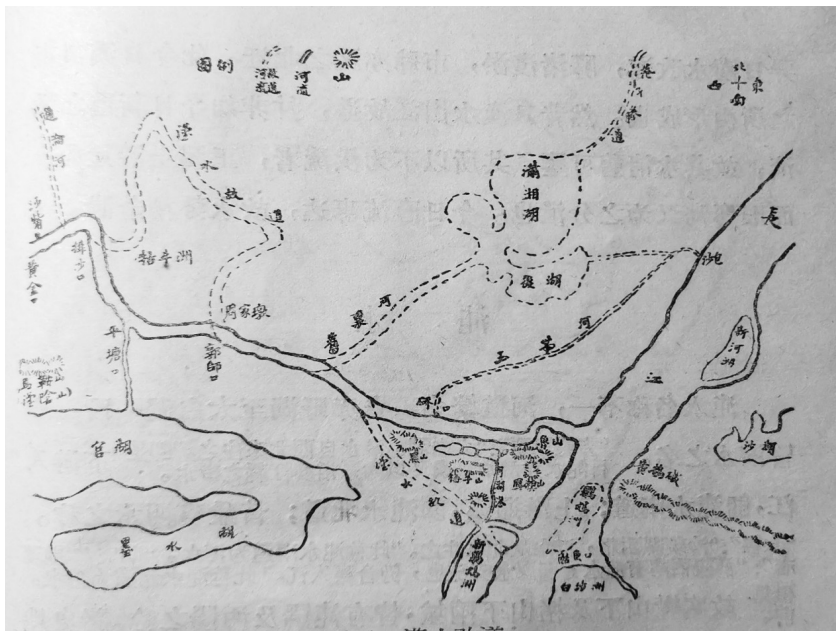
清末汉阳府地图上的汉水故道

南”，我们实在难于理解仅早于范成大游览鄂州八年的陆游，何以留下与前述范成大说法相反、完全颠倒了南北方向的记载。

至于胡三省注《资治通鉴》云“汉水与江合于鲁山西南”，这句话当为胡氏缀拾《禹贡》等旧文补苴罅漏而致误。^[8]也许在胡三省看来，既然唐代《元和郡县志》以后人们指汉阳鲁山为大别山，他这样写只是把大别山换作鲁山，实际上仍是沿用《禹贡》等经典“汉水与江合于大别山西南”的成说而已，但胡氏没有注意到，《元和郡县志》既指汉阳鲁山为大别山，又说汉水在大别山北，业已将《禹贡》大别山由汉水东北搬到汉水之南，从而颠倒了《禹贡》关于汉水与大别山的相对方位。

再如《明史·地理志五》汉阳府条：“大别山在城东北，一名翼际山，又名鲁山。汉水自汉川县流入，旧迳山南襄河口入江。成化初，于县西郭师口之上决而东，从山北注于大江，即今之汉口也。”这是主张汉江自龟山南改道龟山北的又一主要史料来源。对此，武汉大学已故著名历史地理学家石泉先生认为，其中“旧迳山南襄河口入江”，是将《禹贡》旧文与明代汉阳方志关于成化初年汉水截弯取直记载比配拼合的结果，并援引确凿权威史料进行辩驳，认为这一说法是违反史实的，不可凭信的。^[9]石先生还进一步提出反证，认为嘉靖《汉阳府志》成书于明世宗嘉靖二十五年（1546年），上距成化初年仅八十年，编纂者朱衣就是当地

人，所记内容亦较翔实，时代则早于清朝乾隆四年（1739年）成书的《明史·地理志》近200年，而其记述所谓成化初年汉水改道，只是说汉水在大别山（龟山）以西，排沙口与郭师口之间截弯取直，将原在汉口地区蜿蜒流淌40里的水程缩短为10里左右，却无一语提到后来《明史·地理志》所记汉水从大别山南转到大别山北之事。假设《明史·地理志》所记属实，那将是震动当地的一件大事，《汉阳府志》编纂者朱衣岂会不知？知而岂会不载？^[10]怎么可能丢了西瓜拣了芝麻，仅仅记载同一时间、同一地段的汉水截弯取直之事？甚且在嘉靖《汉阳府志》之后的几种地方地理水利之书，如《江汉堤防图考》、万历《汉阳府志》，对此事记载都与嘉靖《汉阳府志》如出一辙，这岂会是偶然巧合之事！^[11]何况早在《明史·地理志》成书之前，清代著名舆地学家顾祖禹所撰《读史方舆纪要》已明确写道：“大别山，在汉阳府城东北百步，汉江西岸。江水径其南，汉水从西北来会于大别之东南。”同时



《武汉市建制沿革》第29页汉水改道示意图

引用历史事实称：“三国初，曹魏定荆州，以文聘为江夏太守，守沔口，吴军来攻不克；后吴人得之，嘉禾中陆逊、诸葛瑾戍守于此；东晋初，荆州贼王贡败陶侃将朱伺于沔口，皆在大别山下也，山亦名翼际山，又名鲁山。”^[12]

清初著名经学家与地理学家胡渭所著《禹贡锥指》卷11下亦称：“大别山在汉阳府城东北半里，汉水西岸。”^[13]并引《左传》、杜预《释地》《地说》《水经注》《元和郡县志》等文献加以佐证，认为汉代江夏郡旧治安陆，东吴时迁移到大别山即鲁山，山左即沔口矣，沔左有却月城。在同书卷14也指出：汉水“又东迳汉阳县北（原注：县为汉阳府治，水去县三里），又东至大别山，折而南，是为汉口，《经》所谓‘过三澨，至大别，南入于江’者也。”^[14]在上述引文中，顾祖禹与胡渭除受李吉甫影响误将汉阳鲁山当作《禹贡》大别山外，他们所援引陈述的汉水从大别山（鲁山）北入江的文献及史实都是正确的。

《明史·地理志》罔顾此前著述记载，所说既与汉阳当地学者所撰方志不合，又与清初地理学名家专著相乖，揆诸情理，当属非是。当然《明史·地理志》记述全国山川，汉阳大别山乃弹丸之地，对其方位不及细察，千密一疏，亦情有可原。

十、当代学者对汉水入江口的辨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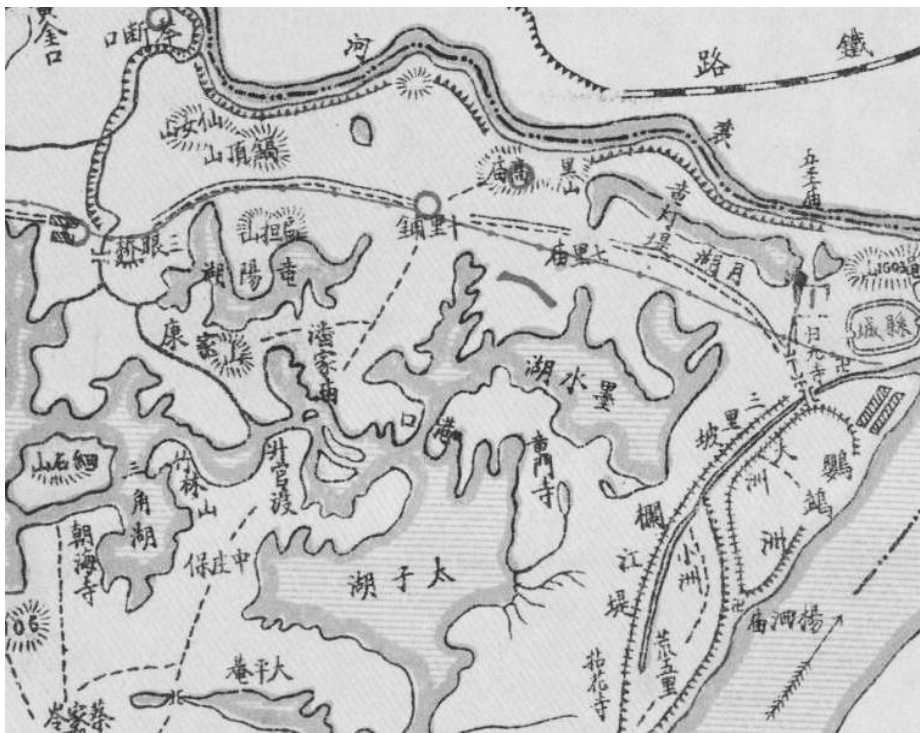
民国学者王葆心认为，汉阳汉口“明初南北岸犹连为一陆，即古所谓沔口者，其水当亦甚微。当时汉口即汉阳，汉阳即汉口。”^[15]明朝成化初年，汉水忽于排砂口下，郭丝口上，直通一道，约长十里，迳从鲁山北麓入江，遂将汉阳、汉口分作两地。

王氏这一说法，显然是对明代成化年间汉水截弯取直的错误理解，成为当代所谓汉水改道将汉阳一分为二说法的直接来源。然而从王氏的明成化以后汉水故道演变为潇湘湖、后湖、玉带河、黄花地的说法来看，可见他是主张汉水原从汉口地区向东汇入长江的。显然，同样主张汉水改道说，王葆心与潘新藻先生所持汉水原从自襄河口下、黑山上东南流过汉阳邓家岭西南入江的观点又有明显不同。

潘新藻先生在《武汉市建制沿革》一书中写到：“汉水入江之口，《禹贡》《孔传》《水经》《酈注》《通志》《明史》《江夏县志》《禹贡锥指》，皆谓触山回南，入江之口，在鲁山之南。其在山北者，乃明成化以后，自郭师口上决而东行，即今日之汉水口也。……《元和志》《夏口县志》《续辑汉阳县志》《汉口丛谈》诸书，误以下通潇湘湖之旧襄河口为汉水故道，是望文生义之过也。”^[16]他进而得出结论：“自襄河口下，黑山上，汉水东南流，径邓家岭西南，值旧鹦鹉洲首端，略对鲇鱼口处入江，此是汉水故道。成化初年，因上游排沙口至郭师口一段冲开，水势劲直东行，出黑山、梅子山、鲁山以北，成汉水新道，而故道遂淤。”^[17]

在上述引文中，作者先是忽视“唐以前无有以鲁山为大别者”^[18]的成例，径直把汉阳鲁山当作《禹贡》大别山，进而作出汉水入江口原在鲁山之南、明朝成化年间改道鲁山之北的结论，这种说法既缺乏文献依据，又不符合汉阳城南的地形地貌，事实上是不能成立的。

第一，在作者列举的上述典籍中，除了清代成书的《明史》《江夏县志》外，其它书都没有任何关于汉水从鲁山南入江的记载。第二，作者指驳《元和志》《夏口县志》



民国汉阳县截图中有间隔圆点的红细线是依古驿道修筑的汽车公路

《续辑汉阳县志》《汉口丛谈》诸书，误以下通潇湘湖之旧襄河口为汉水故道，是望文生义，这不仅对《元和郡县志》属于子虚乌有，因为该书只肯定了汉水从鲁山（大别山）北入江，并没有也不可能提到后世才形成的通潇湘湖的旧襄河为汉水故道，而且现已发现的明清文献及舆图业已证明，《夏口县志》《续辑汉阳县志》《汉口丛谈》认定的汉口潇湘湖或旧襄河为汉水故道是符合实际的。第三，从地形地貌看，汉阳城南七里庙、十里铺以及杨家岭、邓家岭一带属于丘陵地貌，地势比周边要高，这既可从杨家岭、邓家岭的地名推断，也可从1931年出版的武汉军事地图的等高线看出来，历史上汉水不可能从这里爬过丘陵山坡流进长江。何况已知汉水主泓在郭茨口（郭师口、郭丝口）上游北岸排沙口流入汉口地区，怎么可能同时又在南岸郭茨口有汉水主泓进入长江？第四，众所周知，出汉阳西门桥往蔡店方向就

是古驿道，十里铺是县前铺之后的第二个驿站，假如说明代成化年以前汉水主泓从汉阳城南入江，其时汉口尚与汉阳陆地连成一片，那么，以联络京城为指归的汉阳驿道，为何不直接通过一马平川的汉口地区前往北方的京城，反而要舍近求远，先西南渡过汉水，前往蔡店铺经汉川然后再折向北方？古驿道的走

向表明，汉阳城西南近郊道路便捷，没有汉水主泓入江的阻隔。民国中期，这段古驿道又成为汉荆公路的起点，再次表明这一带不是地势低洼的古河道。

殊不知早在《武汉市建制沿革》出版之前，同样为地方文史专家的扬铎先生，在对汉水入江口进行深入研究后就表示：“或以为汉水入江，尚有沌口及汉阳南门二说，我在初有点相信，既而过细考证，觉得不大可能。（一）沌水，据《水经注》称为‘上承沌阳县之太白湖，东南流为沌水，迳沌阳县南注于江，谓之沌口。’这是沌水别为一水，与汉水为二，而汉水下游都是一派平衍，纵然水汛，似乎也不致夺沌水而出，而况汉水以大别之坂为它奔赴之的，千里浩瀚，可供驰骋，此其不可通的理由之一；（二）汉阳南门外，在唐宋时代为郎官湖……是今城南河泊所一带，应为郎官湖故址，不得指为汉水入江之处。我初持此议，尚

觉未敢自信，经科学钻探，地层纯系污泥，并非沙土，此可为湖泊之证，绝非河流所经。在明成化未改今道以前，汉水迤北而行，且中隔丘陵地带，势不致南流，改道以后，也未闻有汉水突出南门之说，此不可通的理由之二。”^[19]

除扬铎先生外，张修桂教授在1984年所发表的长篇论文中，分五个方面对宋代以前汉水入江口在汉阳城南说进行了有论有据的辩驳，进而得出“汉魏六朝时期，汉水始终稳定在龟山北麓、却月城之南注入长江”的正确结论。^[20]张修桂教授的文章实际上否定了把汉水入江口定在汉阳城南、武昌鲶鱼口对岸，而把却月城置于汉阳龟山之上的做法，可惜这一独到观点长期未引起武汉学术界应有的注意。

十一、本文主要研究结论

西北东三面高山隆起、中间低下并向南敞开的马蹄形环状地形地貌，造就了湖北省江汉纳千河、汉江汇长江的水系图景。汉水下游支派纷歧，千廻百转，最终依然流入长江，由此呈现汉水支派多口入江的状况，这在明清汉阳地方志如嘉靖《汉阳府志·方域志》、嘉庆《汉阳县志·山川志》中均有详明的记载。除了明清地方志记述的流量较大、为人周知的沌口、新滩和沙口等处汉水别派入江口以外，在明清及民国的地图上，所标示的汉阳琴断口至平塘湖一线、月湖至莲花湖一线、月湖港及夹河等残存河道，历史上应该曾经是汉水分流入江口，但这些都不当影响本文汉水主泓入江口的基本结论。

总括以上论证，本文得出以下结论：第一，《禹贡》大别山在汉水以东，汉代庐江郡安丰县西南，即今天鄂豫皖交界的大别

山，包括其余脉鄂东北低山丘陵地带，不是唐代以后人们理解的汉阳鲁山（龟山），不能作为先秦汉江主泓在汉阳翼际山（鲁山、龟山）入江的标志物；第二，先秦时期汉水主泓自西向东流淌，受阻于大别山余脉鄂东丘陵岗地而南折，大致先后在今武汉市新洲区阳逻龙口、黄陂区沙口（沙芜口）、滢口等地点汇入长江；第三，大约在秦汉时期汉水主泓道继续南移，在今汉口地区呈现河湖串联、回环曲折的景象，入江口则稳定在汉阳鲁山（今龟山）北麓，近两千年来没有发现大的改变；第四，东汉末年三国初期与汉阳鲁山城相对的却月城在汉水北岸，大致方位应在今汉口汉正街滨河地段，它是目前已知武汉三镇最早的古城；第五，汉阳县得名并非源自水北为阳的古训，其治所无论隋代在临嶂山还是唐初搬迁至凤栖山南，始终都处在汉水之南。历史上不存在汉水主泓由汉阳城南改道汉阳城北的变迁，所谓明代成化年间汉水改道将汉阳、汉口一分为二的流行说法缺乏可靠历史依据。

注释：

[1] 当代有的著作写作唐代城门。明朝嘉靖朱衣所作《汉阳府志·方域志》称：“按赵志，则汉阳古已有城，但所注八门者，不知何代城。”明朝万历《汉阳府志·创置志》城垣称：“宋宣和三年（1121年）四月，水涨城毁，郡守具奏修筑。按赵志，则汉阳古已有城，但所注八门，代更远耳。”另据顾祖禹《读史方輿纪要》卷76《湖广二》引《城邑考》称：“府城旧周六里，有门八，宋宣和三年水涨城坏，寻复修筑。”据此，汉阳城汉广门应筑于北宋宣和以前。引文见贺次君、施和金点校本《读史方輿纪要》，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3545页。

[2] 明朝隆庆二年施笃臣辑《江汉堤防图考》卷上《汉阳堤防考》：“该县旧有襄阳，在汉口北岸十里许，即古汉水正道。汉水从黄金口入排沙口，东北转折环抱牯牛洲，至鹅公口又西南转北至郭师古（口）对岸曰襄阳口，约长四十里，然后下汉口。成化初，忽于排沙口下、郭师口上直通一道，约长十里，汉水径从此下，而古道遂淤。”其中提到汉阳有襄阳、襄阳口地名，与上引明代嘉靖《汉阳府志·方域志》一段文字略有不同。

[3] 江浦等《汉口丛谈校释》，湖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77页。

[4] 《湖北文征》第10卷，湖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52-153页。

[5] 《入蜀记》，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版，第73页。

[6] 张修桂《汉水河口段历史演变及其对长江汉口段的影响》，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4年第3期。

[7] 《入蜀记》，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版，第72页。

[8] 《尚书·禹贡》：“嶓冢导漾，东流为汉……至于大别，南入于江”；《水经·沔水》：“又南至江夏沙美县北，南入于江”；《地说》：“汉水东行触大别之阪，南与江合”；隋郎茂撰《诸州图经》亦称：“汉水东行，触大别之陂，南与江合。”

[9] 石泉《古代荆楚地理新探》，武汉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383页。

[10] 石泉《古代荆楚地理新探》，武汉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384页。

[11] 明朝隆庆《江汉堤防图考》卷上：“今考汉江图，西自汉中流至汉阳大别山，出汉口与江水合，即汉水故道也。”

[12] 顾祖禹《读史方輿纪要》，贺次君、施和金点校，中华书局，第3498页。

[13] 《禹贡锥指》，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374页。

[14] 《禹贡锥指》，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552页。清代著名校勘学家丁宴并不同意胡渭的观点，在同书553页，“丁宴曰：《锥指》于大别依杜预谓在江夏不在安丰，引《元和志》鲁山一名大别山，在汉阳县东北一百步。案《汉志》六安国安丰自注：《禹贡》大别山在西南。《水经》云：大别山在庐江安丰县西南。今安徽颍州府霍邱县即安丰地，县西南九十里有大别山，一名安阳山是也。若东樵所称鲁山，《水经·江水注》所云古翼际山也，唐人妄以为大别，东樵从之，误矣。”

[15] 王葆心《续汉口丛谈》，湖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1页。

[16] 潘新藻《武汉市建制沿革》，湖北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26页。

[17] 潘新藻《武汉市建制沿革》，湖北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28页。

[18] 扬铎《武汉沿革考》，中国档案出版社，2004年版，第19页。

[19] 扬铎《武汉沿革考》，中国档案出版社，2004年版，第108页。

[20] 详见张修桂《汉水河口段历史演变及其对长江汉口段的影响》，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4年第3期。

张笃勤，武汉市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武汉市政府文史研究馆馆员、本刊顾问

我的歌唱家老师段君亮

◇ 周希正

武汉是一座拥有歌咏传统的城市，抗日救亡、武汉解放、抗美援朝、长江大桥通车、汉版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上演，街头无不出现群众歌咏活动的热烈场面。特

别是1965年4月5日，周恩来总理在武汉观看汉版《东方红》之后，留下“后来居上，精益求精”的题词，歌咏爱好者备受鼓舞。我的声乐启蒙老师段君亮先生，就是汉版



段君亮在汉版《东方红》中演唱《长征》



汉版《东方红》主要歌唱演员吴雁泽(左二)、段君亮(右二)

《东方红》男高音独唱《长征》的演唱者，他时常在城市歌咏活动中放歌，成就了艺术履历中的一段高光时刻。

因歌结缘

早在20世纪60年代，段君亮老师就是武汉观众喜爱的歌唱家。从我知道他那一天起，在那个没有流量运作、没有粉丝团队推手的年代，其热度十多年不减。我儿时参加的多次演出中，节目单上只要有男高音演唱，就一定会有段老师的大名。记得在武汉剧院、硚口区委礼堂，总有观众想方设法绕到后台，想看看段老师的风采。



1971年，段君亮风华正茂

我不知道段老师为什么这么有人气，一天参加硚口区音乐会演出童声独唱，伴奏老师肖挺柏先生看了节目单说：“周希正你不简单，你排在段君亮老师前面唱，莫紧张。”我当时哪里懂声乐，在段老师这位声乐大佬面前演唱，竟然无知无畏，还蛮享受。等到段老师上台，“二月里来呀好风光，家家户户种田忙”自带气场，一口气唱了好几首，观众仍不让他下台，非要点他那首拿手的《长征》。最后，“红军不怕远征难……”



1991年，吴雁泽在北京音乐厅后台探望武汉星海合唱团 段君亮摄

越唱越嗨，直到他解开脖子上的纽扣，用完美的高音收住，引发雷鸣般的掌声。

太厉害了！一种舞台、演员、观众融为一体的歌唱场景，真切再现了《东方红》那个气宇轩昂的男高音。那个时候，男高音视为“难高音”，段老师却因演唱《长征》名声大震，拔丁抽楔解决了声乐界“难高音”的技术问题。我一下明白，段老师为什么在观众中这么有热度。同时，也因为他的舞台歌唱魅力，让我直观领略到声乐艺术的感染力。多年之后，当我成为一名声乐教授，这种“人歌合一”的歌唱境界，就是我舞台实践和理论研究所追求的境界。

段老师的舞台风采，让我由衷崇拜，也向往能成为他那样的歌唱家，以至上中学自作主张，将学籍转到段老师任教的武汉二十七中。试唱后，他认为我还处在变声期，又是理科重点班的学生，建议我全力备考，先学好文化课。在艺术梦想的失落中备考，每当听到段老师在音乐教室练声，便心猿意马游离在数理化之外。今天回想起来，真对不起教我的数理化老师，他们是那样的敬业，怀疑我“早恋”而专门家访做工作。是的，

我确实也“早恋”了，只不过是恋上了声乐艺术，结果高考成绩只够上不理想的学校，只能进不喜欢的专业，这辈子再也难圆歌唱家之梦了。

也许是天意吧，当我转档案时，在学校门口巧遇段老师，得知我的情况后，他说：“你是搞艺术的料，如果还想唱歌，跟我学，现在我可以教你。”

在我人生的关键时刻，段老师犹如天降一般，收下了我这个徒弟，带我真正走进歌唱世界，并在探索声乐艺术奥秘的路途上，结下了情同父子的“师徒缘”。

歌者之道

段老师穿行在讲台与舞台之间，这种杏坛与歌坛的双重角色，使他身上多了与众不同独特气质：艺术上张扬，文化上内敛——文化与艺术的融合，构成了艺术家的浪漫与教育家的情怀。每当别人问“你是段君亮的学生？”我就很自豪。坊间流传的“段君亮”是一个传奇，而我作为他的弟子，所接触的“段君亮”更真实，比那些加了“编者按”的传闻生动精彩得多。



1990年，段君亮（左四）参加作者的毕业音乐会

在我上课的钢琴上方，挂有一幅书法作品，简单的“气、声、字、出情”几个字，是一位书法家赠给段老师的。有一次回课时，我考虑技术成分多了一些，段老师停下来，没有直接指出歌唱中的问题，而是指着书法作品说：“这幅作品好在哪里？”我疑惑地答不上来。他告诉我：“这是草书，一撇一捺很连贯，能体现书写者的艺术神韵。你唱歌也要连贯，歌声不要随意断开，歌唱的情感和韵味要在流畅中得以保持。炫技不是歌唱的目标，情感抒发才是目的。”段老师通过中国书法下笔的一撇一捺，告诉我书法作品中流动的气韵，希望我能悟出歌唱的“意”与“韵”。当年我似懂非懂，但这种传统文化的熏陶，时时刻刻融化在老师对我的培养之中。

在我的艺术实践中，许多次和段老师同台，在同行比较纠结的舞台角色分配、演唱场次调整，甚至演出报酬等等，在他眼里都是俗事。歌唱的属性是愉悦，段老师是永远保持着这样一种初心的，他开朗的笑声和他激情的歌声一样迷人。有位师姐是武汉小有名气的歌手，一次在武汉剧院演出时，报幕员失误将名字报错，她在后台不依不饶，与导演闹得不愉快。回家的路上，段老师语重心长地说：“风物长宜放眼量，不畏浮云遮望眼。”这让我认识到他在艺术、人生站位上的高度，更理解他为什么能在任何情况下“随遇而安”。

当年，作为歌唱家的段老师，住的是小两室一厅，我们上课就密密麻麻挤在厅里。每个星期天，他一家都会被打扰，贤惠的师母总是将自己关在小厨房里，听话的小弟弟段戈扬只能在小小空间放飞他的纸飞机。有时，纸飞机飞到钢琴上或是我们头上，为声乐课增添花絮。

老师家的温馨氛围，让我们在烟火气中体会幸福的寓意，懂得生活的真实才是艺术浪漫的前提。声乐是舞台表演艺术，许多歌唱演员在舞台上张扬性格，但如果将舞台感觉带入到生活中，用武汉人的话说，就有点“讨人嫌”了。段老师深知这一点，他时刻敲打我们不要“讨人嫌”，希望我们在舞台上绝对张扬，在生活中绝对不张扬。是啊，这种张扬与内敛的平衡，就是老师做人做事的模样。

现在回想起来，段老师之所以在舞台上自带“气场”，来自他有丰厚的文化底蕴支撑。“气、声、字、出情”，体现了老师歌唱的人文气质；“风物长宜放眼量，不畏浮云遮望眼”，展现了老师育人的大度风范。这些，都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从而努力去做一名有文化底蕴的歌者，做一名有情怀的园丁，用诗意的生活串起舞台、讲台和远方。

真情如歌

段老师因男高音而成为名人，也因名人效应聚集了一批学生，跟随他一起追梦。

在二十七中教工宿舍，段老师褪去舞台光环，化作辛勤园丁回归讲台，散发着艺术的光和热。经常有校外的学生，到二十七中打听段老师在哪里教学，他的家也不间断的总有学生上课。可以这样说，如果二十七中的教工宿舍放在现在，说不定会成为歌唱爱好着的“打卡地”。许多歌唱少年从这里出发，走向了艺术殿堂，有的成长为中国煤矿文工团、湖北省歌剧团、武汉歌舞剧院、湖北省汉剧团、湖北省说唱团和胜利文工团等部队文工团的艺术家；有的成为武汉大学、华中师范大学、武汉音乐学院、江汉大



1974年，段君亮带领武汉二十七中宣传队在街头演出

学的音乐教授。如此高的成材率，可以媲美许多艺术专科学校。

成为段老师的弟子，是我人生的幸事。他似火的热情，不仅燃烧自己，更多点亮别人。二十七中的《白毛女》剧组，是段老师与搭档黎爱芳老师组建起来的。段老师负责乐队，黎老师排练芭蕾舞。这个不计任何功利的艺术团队，当年演遍了武汉三镇，几任喜儿、大春哥的扮演者，都被部队招为文艺兵。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来自六角亭、铁路外的平民子弟，因为在《白毛女》剧组得到艺术熏陶，因为怀有艺术梦想，精神上很愉悦，人生道路也得以改变。如今每次聚会，黎老师提及当年，总要绘声绘色模仿段老师的神态和声调：“那个李春梅，又和社会上的男孩子约会，我们今天晚上排练后，一起去六角三巷抓他们。”“陈建桥是个搞艺术的，怎么去了纺织厂！那怎么行呢？那我要管管他的。”

我在中年后，由于高校科研、教学的双重压力，渐渐远离歌唱舞台。段老师对此非常不满，让黎老师转告我，如果放弃歌唱



1991年，北京工人体育场，武汉星海合唱团合唱荣获金奖，段君亮担任《平原的太阳》的朗诵

就不认我这个学生。黎老师活灵活现再现段老师生气的样子：“周希正如果不坚持唱歌，再也不理他了，我教了他一场，太没有良心了，就这样放弃歌唱。”段老师就是这样一个纯真的人，如果我放弃歌唱，最伤心的一定是他老人家。如果没有他的鞭策，我想舞台上早就没有了我的身影。是老师榜样的力量，让我一直坚持在舞台上放歌，如今还能在琴台音乐厅演唱。

往事如歌，温暖又温馨，几十年后大家再回首，都感叹那个年代结下的师生情谊，淳朴的如醇香的酒，真实的如段老师的歌。李春梅、陈建桥、陈涛、刘希玲等同学，不会忘记段老师在他们成长路上所给予的指引和鞭策。

直到今天，朝杖之年的段老师，依然保持着对歌唱的热情，依然保持着对艺术的那份初心。他和老师哥陈建桥再扛《白毛女》艺术团大旗，在歌咏活动中继续发挥着光和热。2019年7月，我带学生赴鄂西采风，行进在神农架的山路上，远远听见路旁广场传来男高音《长征》的歌声，是那么熟悉，是那么亲切。随着车流经过，我看到舞台上正在演出的，真的就是我的段老师。

太意外了！跨越半个多世纪的演唱，歌声绕梁，群山回荡，依然那么激情似火。我大声对我的弟子说：“这是我的老师，你们的师爷爷！”我真想中止行程加入歌唱，无奈单行车道上后车鸣笛催促不停。然而，此情此景，该是多么动人：老师、我、我的弟子师徒三代，共同前行在追梦的路上。

从段老师参与《东方红》演唱，到我咏叹《汉正街组歌》，从1998年为抗洪大军擂鼓助阵，到2021年机场送别白衣战士，我们的歌咏都交融在城市文化生活中。武汉的城市歌咏成就了我们，我们的歌咏也体现了江城文化特色。一代代的艺术传承，汇入城市生活的烟火气，犹如铫子煨的藕汤香味袅袅……



作者探望段君亮老师和师母

回望来时路，我要感谢段君亮老师：一位永远充满生活激情、永远保持艺术纯真、桃李满天下的声乐伯乐。

周希正，华中师范大学音乐学院教授

一块石碑再现百年消防往事

◇ 陆时正

汉口长堤街与自新巷交汇处，矗立着一栋三层楼房，是武汉市文物保护单位“汉口义勇消防联合会旧址”，其全称应为“汉口公益联合会义勇消防总队部”。这里曾是民国时期汉口民间消防组织的总机关，统筹管理全汉口的民间消防力量。由于旧城改造需要，2016 年对旧址进行了整体保护性平移，作为武汉首例吸引了众多媒体关注，新华社、央视进行了全程跟踪报道。

旧址楼房为百年老建筑，曾经多次改造，结构破损严重，为四级危房。至于其来历，多是口口相传，文字记录并不多，对于研究武汉城市消防史不得不说是件憾事。幸运的是，为保护文化街区，今年启动了旧址修缮工程，其间不少惊喜，如发现工商部注册的汉阳裕记机制青瓦、农商部注册的汉阳和兴红瓦和沙湖青砖等，表明该楼大致在民国初期建成；建筑南北墙体使用的砖材不同，南面多用青砖，北面使用红砖，表明旧

址实为两栋建筑，且南面建成时间早。

随后，更大的惊喜悄然而至。在对一楼北面墙体进行清理加固的过程中，墙砖掉落，一块黑色石碑露出一角。继续清理发现，竟然是一块完整的汉白玉石碑，隐藏墙体内不知几度春秋。斑驳的石碑正文字体较小且风化严重，考证不易；而左右两侧字体较大，清晰可辨。右侧文题为“汉口市保安联合会议务消防员救火捐躯义士享堂碑记”，左侧落款时间“中华民国二十二年癸酉岁春三月十九日公立”，据此揭开了这座百年建筑的神秘面纱。

根据碑文所记，立碑时间为 1933 年 3 月 19 日，显然晚于旧址建成时间。经过反复核对和考证，碑记正文内容 835 个字，记述了该建筑的建设意义、资金来源、有功人士和建成经过。

碑文以“古者立祀，凡以崇德报功也”开篇，为全篇立意。随后以反问句“仅十余



1952年11月1日，归元寺内敬立“汉口义勇消防烈士纪念碑”

年而即忘之，不为之立祀致享，殊非人情，抑岂天理？”强调不能因为时光流逝，而忘记那些深入险境救火牺牲的消防义士。紧接着阐释了纪念救火捐躯义务消防员的原因，“盖汉口人烟稠密，稍一不慎，致兆焚如，各保安会消防义务员闻警驰至，奋勇灌救，而风助火威，华屋瞬息焦土，高墙秃立，坍塌成排。各义士竟以身殉，断脰折颈，粉身碎骨，抑何惨已。”义务消防员为了救火奋不顾身，哪怕牺牲生命，这种舍生取义的精神是多么令人崇敬啊。“当时大总统黎公闻之，僭马题额褒荣。”民国大总统黎元洪为救火捐躯的汉口消防三义士题写匾额“马冠周、马焕奎、杨德山三义士：以死勤事”进行褒奖。“四方人士，白马素车，躬临会葬者不可以数计，挽言谀词，极一时之盛。”可见，当时人们对消防义士是非常敬仰的。于是，各团联合会开会决议，“就会所余址建筑享堂一楹，享祭诸义士，凡救火捐躯及尽瘁社会有功于人者得共享”。由此可知，北面建筑为义士享堂，南面建筑为各团联合会会所。

碑文还简述了义士享堂的建造经过，“辛酉春，迺鸠工庀材，土木以兴，至仲秋始庆落成”，即1921年9月建成。最后，碑文感慨，“今乃于蝇营蚁附之区，而遇此烈焰冲天、蹈之若饴如诸义士者，焉可以不永其祀，而使之食血百世乎。爰立堂以享之、纪碑以永之，为后死者所不宜辞。”在表达对消防义士无限敬意的同时，警醒后人要不忘义士遗志，继承消防事业。

碑记全文立论明确、观点鲜明、论述严谨，年代感强，对于后世了解百年前的城市消防历史具有较高的研究价值。然而碑记只是大量信息的浓缩，要真正理解碑文内容，必须纵观整个汉口城市消防史，对大量史料进行系统爬梳、深入探究和全面考证。

“十里帆樯依市立，万家灯火彻宵明”，这是百年前“驾乎津门、直逼沪上”的汉口繁盛景象的生动写照。然而，繁盛的背后是商民集聚、货栈堆积、棚户栉比，稍有不慎，致兆焚如。频发的火灾令商民不堪其扰，轻则火燎屋毁倾家荡产，重则火烧连营酿成巨灾。汉口火灾损失，一度居全国之首。

清末民初，时局不靖，官府无力筹办消防，为求自保，民间自发办理消防的意愿



2016年2月4日，汉口义勇消防联合会旧址平移前 史忠树摄



2023年5月26日，汉口市保安联合会义务消防员救火捐躯义士享堂碑记 陆时正摄

愈发强烈。汉口绅商仿上海救火会章程，发起成立保安会、公益会、消防会等民间消防组织，由各商铺店东、店员充任义务消防员，没有薪饷，全凭自愿，各地段街邻捐款购置消防器材，租用办公场所，甚至集资建造专属办公楼。此后，一支支民间消防队伍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为保护商民生命财产安全发挥了重要作用。

然而，各地段消防力量不相统属，素质参差不齐，本地段火灾或难以扑灭，他地段火灾或出工不出力。特别是各地段囿于自身利益，火场混乱不堪，一遇大火，难以收拾。为此，各会负责人开会决议，组成统一的联合体——汉口各团联合会，于武昌首义爆发前的1911年4月8日召开成立大会，当时分会组织已达28个。随着分会数量增多，各团联合会势力不断扩大，地位仅次于汉口总商会，且因成员多为普通商民，具有更广泛的民众基础，自然而然地成为了传播进步思想、“胚胎革命”的民间组织。

在武昌首义期间，各团联合会发动分会成员资助民军、运送弹药，甚至领受新军枪支，荷枪实弹抵御清军、维护治安，受到

民军重视和信任。辛亥兵燹后，各团联合会遭受重创，但很快恢复元气，于1912年6月进行改组，由干事制改为会长制。此后又几度易名，1927年更名“汉口保安联合会”，1933年更名“汉口保安公益会”，1937年会内设“义勇消防总队部”，1946年更名“汉口公益联合会”，直至新中国成立后1952年11月被解散，309名脱产人员被接管吸收，扩充了公安消防队伍。

自各团联合会成立至公益联合会解散，40余年间为救火捐躯义务消防员达27人之多，汉阳归元寺内敬立着“汉口义勇消防义士纪念碑”，铭刻了27位义士芳名。

从民间消防到义勇消防，从公安消防到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守护城市安全，护卫百姓安宁”始终是城市消防力量不变的主题。



2023年10月16日，汉口义勇消防联合会旧址修缮竣工 陆时正摄

依托汉口义勇消防联合会旧址，武汉建设“应急消防科普教育基地”（消防博物馆），届时这块碑记将作为重要文物进行保护性展陈。

陆时正，蔡甸区消防救援大队副大队长

1938 年白求恩在汉阳天主堂的一周

◇ 高锐庆

1938 年 1 月，加拿大共产党员、国际主义战士白求恩大夫带领的医疗队，取道香港乘飞机抵达武汉。其时适逢武汉会战，在等待中共安排去八路军抗战前线的日子里，他在汉阳一所天主教堂参与救治受伤军民，短暂的一周时间为武汉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援华来到武汉

诺尔曼·白求恩，1890 年出生于加拿大安大略省格雷文赫斯特镇一个牧师家庭，青年时代当过轮船侍者、伐木工、小学教员、记者。1916 年毕业于多伦多大学医学院，获学士学位，曾在英国和加拿大担任过上尉

军医、外科主任。1922 年被录取为英国皇家外科医学会会员，1933 年被聘为加拿大联邦和地方政府卫生部门顾问，1935 年被选为美国胸外科学会理事。他的胸外科医术在加拿大、英国、美国医学界享有盛名。1935 年 11 月，白求恩加入加拿大共产党。

1936 年冬，白求恩志愿赴西班牙参加反法西斯斗争，任加拿大援西反法西斯战争医疗队队长，在马德里抢救伤病员。为抗击意大利和德国法西斯对西班牙的侵略，他接受西班牙共产党的建议，1937 年回到北美洲讲演和募捐。这时，中国发生了七七卢沟桥事变，日本法西斯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地球东方的这一事件立即引起白求恩的关注，他认为西班牙已经得到了广泛援助，而



白求恩在抢救伤员

援助中国的第一步还未跨出去。于是，他改变行程，决定到中国去。

就这样，白求恩于1938年1月率领加拿大共产党和美国共产党联合派遣的援华医疗队，带着价值5000美元的医药器械及筹募的援华款项，乘“亚洲皇后”邮船抵达香港，旋即转乘飞机来到他的中国内地之行第一站——武汉。在机场，白求恩一行受到美国著名记者史沫特莱和国际红十字会的热烈欢迎。

白求恩一到武汉，顾不得旅途疲劳，就急切要求去八路军抗日前线，声明说：“我的战斗岗位在前线。”刚刚在美国主教鲁茨家里住下，他就前往八路军驻汉办事处。当晚，周恩来热情接待了白求恩和他的援华医疗队队员，建议其先在后方参观一些医疗机构，然后去延安。

在等待八路军办事处安排去抗战前线的日子里，白求恩把时间安排的满满当当。他到武汉的一些医院里参观，了解情况，还会见前来武汉办事的八路军卫生部长姜齐贤。听到姜介绍前方药品不足、器材短缺的

情况后，他便和尤恩一起奔波于武汉三镇，加紧采购外科器材和医疗用品，以备前线之用。

经美国记者史沫特莱牵线，白求恩认识了当时在汉阳天主堂主持工作的爱尔兰神父高尔文（后来成为天主教汉阳教区主教）。白求恩参观天主堂时看到大量伤残军民，便请求主教让其留下，在天主教修女们的协同下，与其助手（加拿大女护士琼·尤恩）一起，在天主教爱尔兰高隆邦修女会兴建的一个诊所（1926年建成，今武汉市第五医院），冒着生命危险工作一周。

修女记忆中的白求恩

白求恩在天主堂救治伤员的一周，并无详细文字记载和历史照片，揭开这段历史的是当年随他来中国的琼·尤恩。1981年尤恩出版的回忆录《在中国当护士的岁月》，记述了她跟随白求恩在汉阳救治伤病员的



伟大的国际共产主义战士、著名胸外科医学专家白求恩

一段难忘岁月。本人2010年2月到汉阳天主堂主持教务，当时从两位年老修女口中，亲闻了白求恩到汉阳天主堂及高隆邦诊所参与治疗工作的一些片段。

96岁高龄的喻修女，曾是高隆邦诊所护士，2011年去世。据她回忆：白求恩来的时候，是一个阴天的上午，他来见高尔文主教，当时还有其他神父在。一行有六七人，他个子很高，头发有点卷，很绅士。不会说中文，只会简单的“你好”“谢谢”之类的话。看他和主教说话聊天，总带着微笑，但是说话铿锵有力。他进教堂做了祈祷，在这期间，外面还有炸弹爆炸的声音传来。

随后主教带他们到诊所去参观。教會的诊所就三层楼，在当时算是很大的，也算是附近的高建筑物。诊所伤病人员很多，根本容纳不下，不得已在外面搭了许多帐篷。旁边还有一颗很大的树，就是现在人们知道的汉阳树。参观过程中，白求恩直接到了病人身边，看修女们怎么包扎治疗，然后他就开始上手。手消毒后戴上医疗手套，让修女们给他递药水、纱布、刀子等，那动作甚是麻利、专业。

等治疗完一个病人后，他转身对主教说：“我想在离汉行程没有落实之前，就在这里治疗病人。”主教微笑着说：“好，谢谢您。”并给他们安排了住宿，住宿就在教堂旁边的附属房。

白求恩是个很风趣的人，那时我们几个修女都只有二十几岁，他夸我们：“你们是天上和地上的天使，我是人间天使。”我们问：“为什么呢？”他说：“你们一生奉献给天主，

天上就有了你们的名字，所以是天上的天使。你们又在地上服务众生，所以又是地上的天使。我是在世界上服务众生的，哪里需要，就去哪里，所以我是人间天使。”

白求恩还是一个工作狂，从早晨7点一直工作到晚上9点，除去午休的个把钟头，他都在救死扶伤。还抽空给我们讲一些医学知识，展示他发明的医疗器具箱。主教劝他：“只有好的休息，才有好的工作。”他却说：“Be the salt of the earth, the light of the world（做地上的盐，世上的光！这是圣经里的一句话）。”主教一言不发，转身让管事的神父特别对白求恩加强饮食营养。

虽然只有短短的一周时间，白求恩却给我们留下了非常深的印象。我们只知道他是要做大事的人，有理想、有追求。

98岁的李修女，也是护士，在高隆邦诊所工作很多年，2018年去世。她回忆：我那时白天在诊所工作，下午三点就回来了，帮助厨房为大家准备晚餐，还要负责打扫客房卫生。白求恩房间永远只有两本书：圣经和医学，都是英文的。他的房间特别整洁，基本不需要怎么打扫。



高隆邦医院旧址，麻建雄拍摄于2017年

他们老是不能按点回来吃饭，我总是把饭菜打好，多跑几趟给送去，反正也不远，就几步路。有时候去收餐具，他们的饭菜都凉了还没顾得上吃，尤其是白求恩的，那可是主教让我们特别加强营养照顾的对象。但是他老是说：“Eat right away, eat right away（马上就吃，马上就吃）。”之后头也不抬，一直为病人做手术。我只能把饭菜拿回来，重新加热，再送过去。他好像对吃的喝的没有任何要求，就是一心扑在治疗病人上。

偶尔看见他们几个医生商讨治疗的事，说话声音很大，感觉在争吵，上了手术台后又特别安静。和白求恩说话，感觉他特别真诚和蔼，修女们都喜欢协助他一起治疗病人。他住我们修女院，总是很晚回来，感觉很疲惫，早晨又很早离开。大概待了一周，他们就走了。走的时候，我记得主教拿了一些银元给他，白求恩不要，甚至还发脾气。主教说了一句话：“For poor China（为了穷苦的中国）。”白求恩很郑重地接了过去，重复主教的这句话：“For poor China！”

“武汉白求恩纪念馆”开馆

白求恩在武汉停留将近一个月，终于盼来了八路军办事处通知他北上的消息。周恩来考虑北线战事很急，便特意派警卫员护送他们先到临汾八路军总部前线卫生部报到。白求恩对此十分感动和高兴，在离别武汉前，他还说服一个在汉教会医院工作的加拿大青年医生随他去了前线。

2月22日，在周恩来具体安排下，白求恩离开武汉奔赴抗日前线。但由于途中遭敌机轰炸，前线八路军卫生部已转移，几经



武汉白求恩纪念馆

辗转，他于4月1日到达延安。白求恩在延安受到毛泽东的接见，不久他要去前线的要求得到批准。后来，白求恩一直在抗日前线殚精竭虑，为八路军治疗伤病员，直到1939年11月12日以身殉职。12月21日，毛泽东亲笔写下了著名的《纪念白求恩》一文，号召中国人民学习白求恩的共产主义精神和国际主义精神。

武汉是白求恩来到中国内地的第一站。白求恩在显正街天主堂的一周，他和武汉的渊源，是武汉医疗战线也是全市民众的精神财富。2009年夏天，在纪念白求恩逝世70周年之际，在他当年抢救过伤病员的汉阳高隆邦医院旧址——武汉市第五医院院内一幢老房子里，白求恩纪念馆正式开馆，医护人员和全市人民得以在此接受白求恩精神的洗礼。

高锐庆，湖北省武汉市天主教教务委员会副秘书长，汉阳显正街天主堂本堂司铎

本刊 2023 年总目录

时代年轮	武汉四医院：巡回医疗创下世界首例手术
“一五”计划：武汉城市发展第三次崛起	杨京（6.4）
涂文学（1.4）	《规约》：武昌农讲所“镇馆之宝”
党引领林祥谦成长为铁路工人领袖	曹波（7.4）
张旭（2.4）	京汉铁路工会会员证章和《二七工仇》
李伯刚撰《“二七”纪念碑文》	张旭（7.12）
黄圣媛（2.9）	武汉电视台光耀三镇
武汉图书馆书香江城	杜宏英（8.4）
王钢（3.4）	根治黄孝河
恩师李崇淮：动议“两通起飞”走在前列	王钢（9.4）
曹远征 高冠江 黄宪（5.4）	1953：“华师”初展风华
	付强（10.4）
	利用外资助力武汉天河机场建设
	张智海（11.4）

追寻毛泽东视察的“武汉地理”

简桦 (12.4)

风雨同舟

一位民革老党员的参政议政路

单大年 (口述) 车璇 (整理) (1.10)

环保提案获奖之旅

王曦 (口述) 黄稳 (整理) (2.11)

从武汉市最烂公路到最牛公路

夏友成 (3.12)

“叶氏车改”的前前后后 叶青 (4.4)

乐为民众鼓与呼

计蕊华 (口述) 吴俊 (整理) (5.10)

用法治方式推动民主政治进步

李春生 (口述) 侯程林 (整理) (6.9)

钻研十余载为种子办理“身份证”

彭海 (口述) 魏贝 张苗玲 (整理) (7.17)

致力为公 建言献策

曾仁端 (8.12)

援疆,以盟员的名义!

梁继鲁 (口述) 宋薇 (整理) (9.13)

一件提案引出十项“柔性”监管措施

万松 (10.12)

江城绽放“格桑花”

侯伯云 (11.12)

一枝独秀景已然 满园春色更可待

张丽琴 (12.14)

九城同心

“进京赶考”警示地——闯王陵

李城外 (1.15)

葛店年俗:龙凤虾灯闹新春 胡绍林 (2.15)

天门——状元之乡探源

胡华 (3.16)

孝感麻糖米酒绵甜千年

肖端武 (口述) 周志超 (整理) (4.10)

阳新采茶戏:一朵质朴的山茶花

费杰成 朱俊峰 (5.14)

与李时珍文化结缘四十年 郑伯成 (6.15)

灯影千秋话沔阳渔鼓皮影戏 郭艳 (7.22)

三峡试验坝:陆水枢纽工程的传奇春秋

冯晓光 (8.17)

英山缠花:忘机传承重现流光

陈广英 (口述) 吴诗颖 (整理) (9.19)

流传千年的鄂东哦嗬腔 邱风 (10.15)

“我本楚狂人”——李白与湖北安陆

朱绍斌 (11.16)

矢志不渝守传承,阳新布贴吐芬芳

吕永超 (12.17)

委员天地

为孩子的“光明”而坚守 杨莉华 (1.20)

科技兴业开启履职新篇 李艳红 (1.23)

尽责履职 同心为民 韩禾 (2.23)

扎根一线的政协“新兵”

严进梅 (口述) 郑雅飞 (整理) (2.27)

做履职有情怀有质量的政协委员

李明 (3.25)

一份建议,为辖区儿童撑起一片天

辜迎春 (口述) 郑雅飞 (整理) (3.29)

履行好双重身份的双重职责

刘劲松 (4.19)

我的两个五年计划

黄荷婷 (口述) 郑雅飞 (整理) (4.23)

国之所需 吾志所向 张凯 (5.18)

政协读书伴我行 卢璟 (5.22)

书香萦绕“云上”朋友圈 樊小伟 (6.21)

为民发声,做好群众“传声筒”

王艺蕾 (7.28)

以学为基,做人民的服务员 毛志远 (8.24)

甘做服务群众的赶路人 项静 (9.25)

“医”心守护群众健康 熊念(10.19)
为民发声做心桥,扎根教坛育英才
常福曾(11.21)
仁和精诚护民安 双岗履职展风范
李智杰(12.22)

商聚汉皋

努力打造湖北人力资源航母型企业
张军(口述) 高爱民(整理)(1.26)
做中国人自己的高端阀门定位器
柳曦(口述) 许濛(整理)(2.30)
专注定制 不负青春 苏超超(3.32)
一个农村娃的商海励志史
李远涛(口述) 南方(整理)(4.26)
撑起华人一片天 共享华天这把伞
范双涛(口述) 何文丽 王萍(整理)(5.25)
酒店人的多彩人生 梁红(6.24)
聚合支付“小巨人”的靠谱之道
王朋(口述) 杨淑君(整理)(7.32)
岁月的陈酿
陈伟(口述) 严濂(整理)(8.27)
在希望的田野上 邓永勤(9.29)
一匹老粗布织出百布堂
刘大友(口述) 袁晨霞(整理)(10.23)
企服市场“摆渡人”的创业之路
胡荣阳(口述) 鲁晓伟(整理)(11.25)
“用心做光”让城市生活更美好
杨冬梅(12.25)

精工匠心

心之所向 无问西东
张力(口述) 白爱萍(整理)(1.31)
砌筑人生
吴春桥(口述) 白爱萍 张文一(整理)(2.34)

我是焊工,也是悍将
程琪(口述) 白爱萍(整理)(3.34)
方寸之地书写节能大文章
李军林(口述) 白爱萍(整理)(8.31)

人物春秋

武大校友杨作材修建延安三座中央大礼堂
徐应荣(1.35)
一代学人:星光闪耀挽联 罗建华(1.43)
陈修诚:新闻工作者是时代弄潮儿
陈修诚(口述) 蔡欣星(整理)(2.44)
童心永在 歌声不息——怀念我的哥哥董宏猷
董宏量(2.50)
在恩师李国平院士身边三十年 陈银通(3.40)
瞿秋白在武汉的“三本书”
金姣 田子渝(4.32)
1927,董必武江城脱险记 郑巍宁(5.30)
赵梓森院士当参事 吴远舟(5.36)
我的父亲曹乐安:首批中国工程建设设计大师
曹小麓(6.28)
我的外科生涯(上) 高有炳(7.37)
我的外科生涯(中) 高有炳(8.35)
刘峻山:首届中央监委唯一幸存者
侯红志(8.43)
我的外科生涯(下) 高有炳(9.33)
穿越时空:走近最可爱的人 宋致新(10.28)
蔡济民敦请黎元洪出任鄂军都督史略
蔡礼鸿(10.36)
陈松林:黄陂籍院士打造水产种业“中国芯”
裴高才(11.51)
杨叔子院士当参事 吴远舟(12.28)

往事漫忆

更新知识为先——我的政协工作体悟(一)
李传德(2.20)

抢救文物为急——我的政协工作体悟（二）

李传德（3.21）

收集文史为要——我的政协工作体悟（三）

李传德（4.16）

我在六中上初中

曾宪德（5.60）

张思卿：引导我成长的几位老红军

张思卿（口述）周冶陶 宫步坦（整理）（6.44）

父亲曹乐安激励我们成长 曹小麓（7.50）

汉正街走出红阳宣传队 周希正（7.55）

父亲周翼南和他的引路人 周璐（8.49）

程思远支持指导武汉“两个关系史”研究

王功安（口述）范前锋（整理）（9.41）

“致车主的信”推动“三车”整治

陈晓桥（9.47）

李国平教授轶事偶记 胡继堂（11.63）

我的歌唱家老师段君亮 周希正（12.47）

书谭擷英

开掘稀见史料 钩沉二程行状——从爬梳

《二程集》到书写《二程夫子》冯天瑜（1.49）

史海钩沉

江浙财团侵占既济水电公司

杜宏英（1.55）

从电影《满江红》追寻武昌岳飞史迹

董玉梅（2.54）

武昌城 1800 年：考古中的历史脉络

许志斌 张剑 朱励博（3.49）

明代武昌的城中城 刘谦定（4.39）

“武汉第一将军乡”——木兰乡

王凤霞（4.46）

“华工筑路团”奋战汉丹铁路

晁晓影 夏增民（5.41）

武昌震寰纱厂票据见证“庆祝六大都市解放”

刘汉桥（5.49）

清代署两江总督陈銓墓的修复保护

张笃勤 夏明智（6.54）

汉正街金庭公店与汉口巡检司衙门

王光（6.61）

抗战时期武昌艺专在江津 张明建（7.45）

“大武汉”一词的历史渊源 王汗吾（9.52）

“岳家军城砖”现身武昌？ 万建辉（9.56）

汉水主泓历史上在哪里汇入长江（上）

张笃勤（10.44）

汉水主泓历史上在哪里汇入长江（中）

张笃勤（11.37）

一位比利时医生镜头中的晚清武汉

麻建雄 孙庆力 韩少斌（11.45）

武汉大学主校门 130 年的演变 徐应荣（12.33）

汉水主泓历史上在哪里汇入长江（下）

张笃勤（12.39）

都市史话

东湖寓言雕塑园忆往 童汉芳（2.61）

汉口民族路和三民路 潘奠元（3.60）

傅斯年图书馆发现《汉口租界图》

章馨怡（4.51）

《江汉揽胜图》与《招鹤亭图》中的江城风貌

马牧宇（5.52）

大桥局的红房子 尹新秋（5.55）

武汉大学四个湖的来龙去脉 徐应荣（6.37）

宋代鄂州南市乃城南之市 刘宝森（8.62）

“宪兵营”外野孩子 余文恭（9.59）

中山舰出水文物中的生活用品

王景景 祁金刚（10.52）

夏口筑城与武汉双城格局的奠定——纪念

武昌建城 1800 周年 涂文学（11.29）

一块石碑再现百年消防往事 陆时正（12.52）

征 稿 启 事

《武汉文史资料》创刊于1980年，是由政协武汉市委员会主管、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主办的公开发行人文史类期刊。2024年，本刊面向社会征集文史资料稿件。主要栏目如下：

【时代年轮】以“逢十”周年为契机，以党史、共和国史、改革开放史为重点，以公众关注度和史料开掘性为特色，聚焦历史上重大事件、重要人物，展现武汉前行的时代轨迹。

【九城同心】助推武汉城市圈同城化发展战略实施，发掘兄弟城市地域文史资源，记叙具有全域影响和地域特色的近现代历史事件、历史人物、文物遗址、典藏风俗、非遗传承等。

【风雨同舟】讲述各民主党派积极参与革命、建设、改革开放实践，民主党派成员新时代履行职责、参加公益和弘扬正能量的故事，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

（下转第64页）

扫街探疑

从一张汉口老地图考证四国领馆馆址沿革

韩少斌（1.61）

汉口英租界战争纪念碑 章 辉（3.55）

从几张老照片再探美国领馆馆址变迁

田联申（4.62）

广东茶商创办汉口第四大茶砖厂

韩少斌（6.48）

汉口日本兵营和中支那派遣队纪念碑

章 辉（8.56）

上海医药博物馆藏梅医生纪念碑

刘 飞（8.61）

辛亥将军开发的大陆里与多闻里

田联申（11.58）

楚风汉韵

武汉竹枝词中的“中秋风情”

李笙清（10.56）

三镇拾遗

汉口民生路和民权路

潘奠元（2.38）

棲隐寺奋力投身救亡救灾活动

释常海（4.57）

木兰山玉皇阁的红色烽火

董理孝（7.60）

薪火相传的古德传奇

灵 德（10.61）

1938年白求恩在汉阳天主堂的一周

高锐庆（12.55）

【委员天地】政协委员讲述开展本职工作、投身履职活动、参与社会服务的事迹、体会与感悟。通过讲好政协故事，传播政协声音，展示政协形象，推动政协工作。

【商聚汉皋】通过挖掘武汉异地商会及其会员企业闯市场、创品牌、谋发展的传奇故事，展现客商在汉创造财富的胆识、干劲和风采，助益本土非公经济发展。

【精工匠心】聚焦我市劳动模范、五一劳动奖章、工匠称号获得者，展示广大劳动者锐意进取、创新实干的生动实践，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

【高校访馆】服务于武汉打造“大学城”，充分利用著名高校博物馆丰富资源，探访专业馆藏故事，挖掘藏品历史信息，面向社会公众推介。

【人物春秋】突出影响历史进程的重要人物，关注具有特殊经历的社会名人，反映取得不凡业绩的普通百姓，立体构建荆楚人物群体画廊。

【往事漫忆】记录当事人、见证人、知情人对某个历史时期发生的重要事件及相关人物的回忆。

【史海钩沉】探求、搜集、整理、再现封存于历史的人物、事件、史迹或文化遗产。

【都市史话】记录武汉建城以来城市化发展过程中某一段历史变迁和人文史话。

【扫街探疑】现场探访老街巷、老建筑、老设施等，订正讹传，发掘史实，填补空白。

【文史随笔】对历史上特定的人物事件或社会现象，从文化的角度进行解读、分析和咏叹。

【楚风汉韵】记述具有楚文化特色和江汉韵味的本地风土人情、传统习俗、艺术典藏等。

【城影留根】通过摄影镜头，抢拍可能消逝的历史遗址遗迹，留存城市影像，挽住家园记忆。

来稿要求：

1. 文章内容客观真实，事件细节具体，文风朴实生动，兼具史料性和可读性。
2. 提倡第一人称口述，撰写“三亲”（亲历、亲见、亲闻）史料。
3. 篇幅一般 3000 ~ 5000 字，提供相关图片，并配文字说明。
4. 文末请注明作者身份与联系方式，便于寄送样刊与稿酬。

稿件电子版请发至本刊邮箱 whzxwszl@163.com，纸质稿件请寄：汉口沿江大道 246 号武汉市政协《武汉文史资料》编辑部。 联系电话：（027）82220669

本刊编辑部

2023 年 12 月 18 日